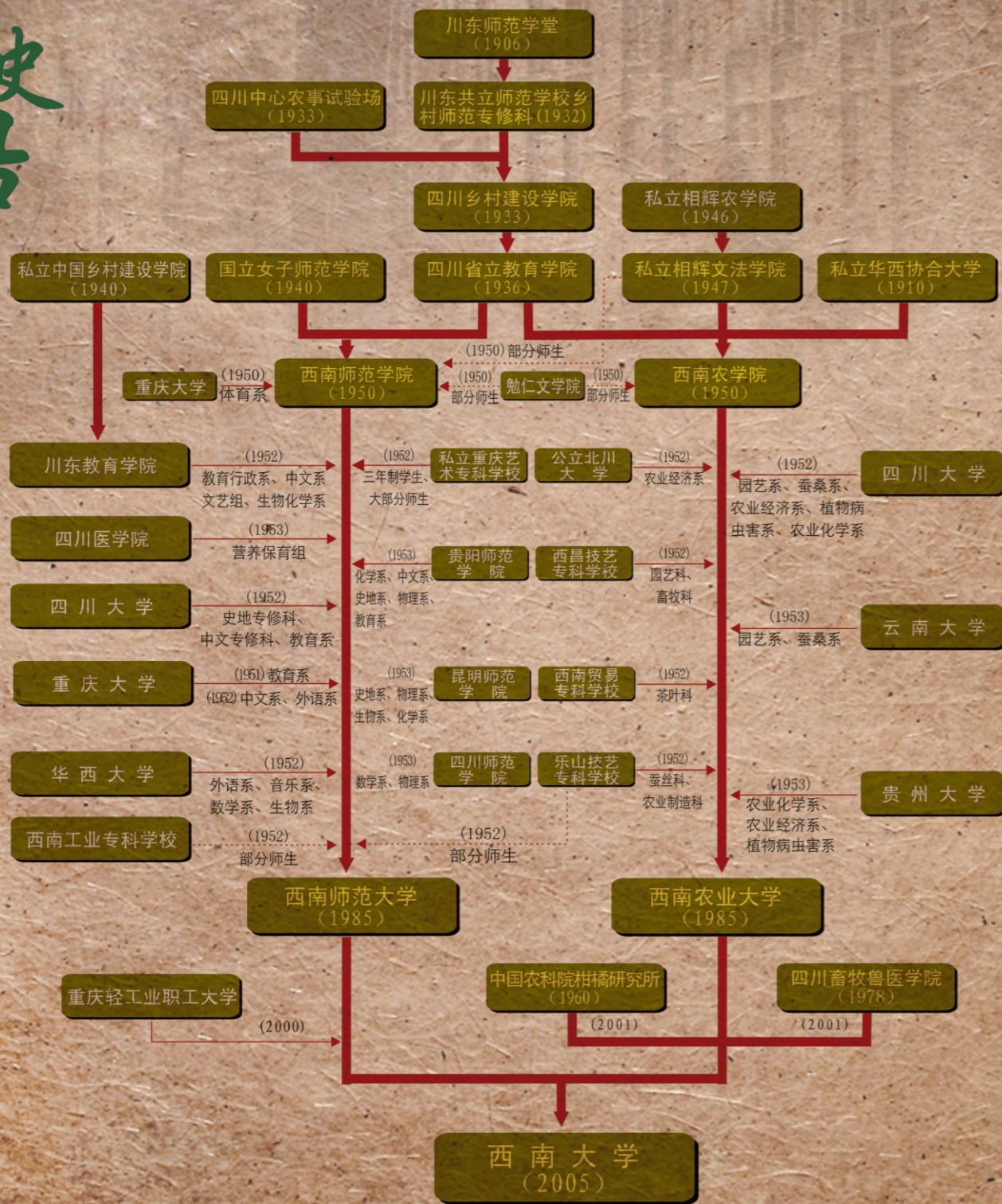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袁烟雨任平生
折冲樽俎的和平老人

档案拾遗

记忆中的私立相辉学院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寻根（之九）
难以压抑的《红楼梦》情结

影像记忆

西南师范学院与《蝶恋花》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私立相輝學院轉學證明書

學生袁隆平現年21歲江西南昌人於公元一九四九年七月入本院農藝系第壹年級第壹學期肄業迄一九五〇年七月修畢第壹年級第壹學期課程茲據呈請轉學應予照准合將該生在校肄業成績列表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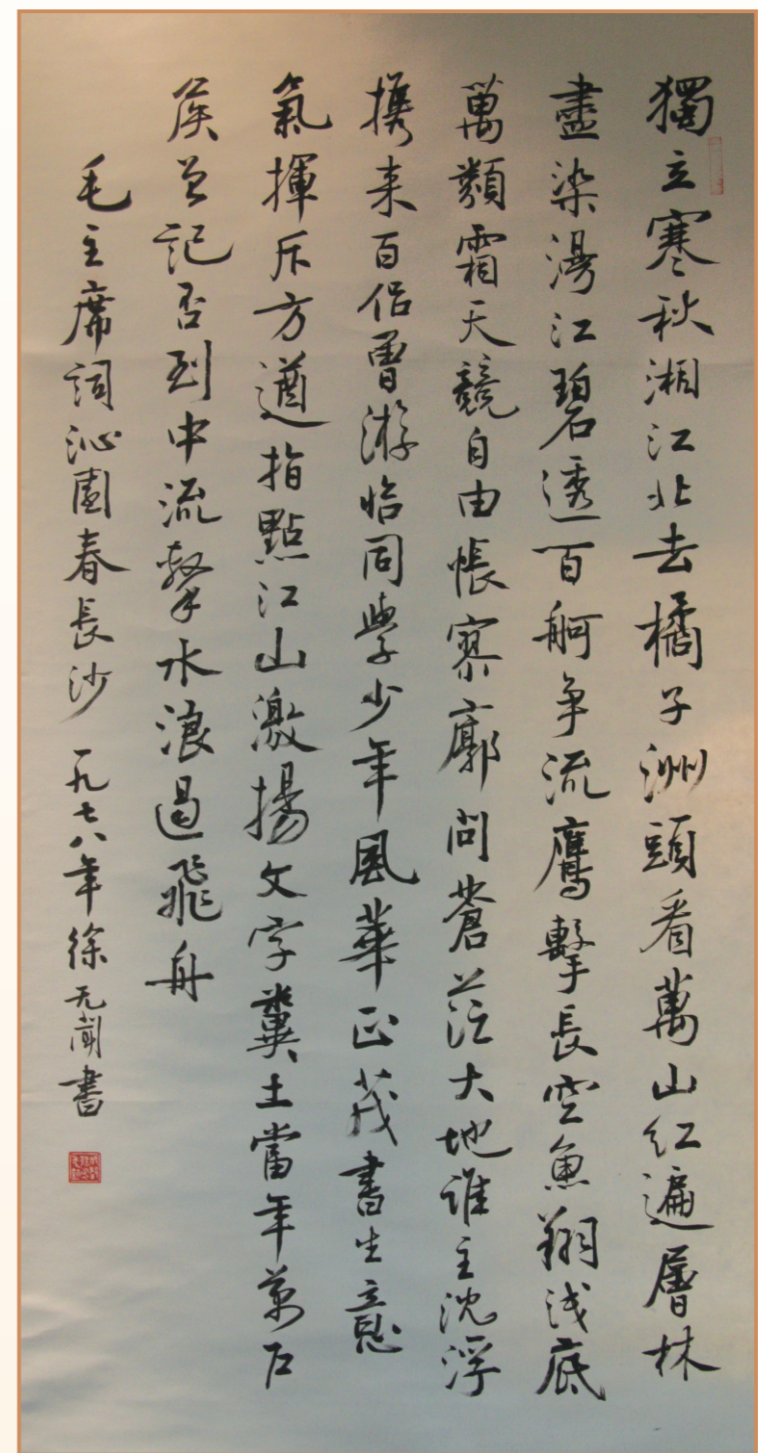
學年	學程名稱	第壹學期		第貳學期		備註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第壹年	國文	4	66	3	60	
	英文	4	92	3	75	
	物理	3	65	4	71	
	化學	3	60	3	74	
	農業概論	3	88	3	74	
	農業機械	3	88	3	74	
	農業經濟	3	84	2	75	
	農業教育	3	84	2	75	
	新民主主義論	2	67	3	66	
	新民主主義論	3	66	3	66	
		共修		總學分		

院長  教務主任  1950年10月 日填發

教育部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指令核准備案茲
據呈請因轉學 他校應予照准合將該生在校肄業成績表列於后

袁隆平从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农艺系转入西南农学院的转校证明书^①

①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2-教学-22。



徐无闻^②书法作品^②

②徐无闻(1931—1993)，名永年，三十后因耳疾更名无闻。生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书法篆刻和唐宋文学两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社员、四川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印社名誉社长。

②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4-SF-1。

刊首语

□文/蒋涛

光影唤醒记忆,历史点亮心灵。

翻阅历史,重拾记忆:一次历史与机遇的碰撞,重庆北碚迎来一座有重要影响的学府——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私立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这三者有什么关联;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在西南大学的办学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文工团何以得到重庆市市委,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垂青;被友人叹为“一代文章矜四海,平生骚怨寄红楼”的国学和红学大师吴宓,在我们曾经的校园里,与《红楼梦》如何谱写生死相许……

追寻校史印记,探求文化源流。本期《西南大学记忆》,谨以清晰而珍贵的馆藏档案再现当年历史,一一为您揭密。

西南文工团

舞台剧

《红楼梦》



重庆秋成都公演剧照

西南大学记忆

2011年第1期(总第10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邓 力

执行主编：蒋 涛

副 主 编：李亚勃

执行编辑：王 贤

编 委：邓 力 潘 洵 蒋 涛
刘重来 李亚勃

编 辑：张晓华 郭 兰 姚 恒
马云飞 朱文婉 唐朵朵
杜玫娟 姜海庭 韦雪贞

美 编：唐朵朵

校训：



目

刊首语..... 蒋 涛

名师风采

4 一蓑烟雨任平生

——官场外的于右任 张昌华

12 折冲樽俎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 马云飞

22 于右任、邵力子与私立相辉学院 ... 马云飞 朱文婉

档案拾遗

28 记忆中的私立相辉学院 唐朵朵

校史校情

31 西南大学寻根(之九)

——西南师范大学的发展(上) 张晓华

35 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 王有超 郭 兰

42 难以压抑的《红楼梦》情结

——“文革”前后的吴宓与《红楼梦》 刘重来

校友天地

50 亮丽在璀璨的星空

——记青年歌唱家李丹阳 刘之昆

录

西大地标

55 西南农学院大礼堂 牟乔雅 王 贤

兼葭之声

58 香樟林的记忆 骆 平

影像记忆

60 西南师范学院与《蝶恋花》 张小兰

西大掌故

65 校园豹影 王远伦 牟乔雅 王 贤

校史论坛

66 从“清华史苑”栏目看校史研究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王向田

封面人物 于右任(右)、邵力子(左)

封二 袁隆平从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农艺系转入西南农学院的转校证明

封三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徐无闻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367435
1592324027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367435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于右任(1879—1964)

编者按：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1903年中举人，任商州中学堂监督。1904年因讥讽时政，遭清政府拿办，逃亡上海，入震旦学院。1906年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赴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国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1909年，先后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宣传革命，时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誉。1912年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及国民党政府检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1964年病逝于台北。于右任一生重教，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于南京政府任职期间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46年任重庆北碚相辉学院董事长。擅诗词，尤精书法，形成“于派”书风，为一代书法宗师，著有《标准草书》、《右任诗存》和《右任墨存》等传世。

一蓑烟雨任平生

——官场外的于右任

□文/张昌华^①

86岁的于右任僵卧在床3个月中，大小便失禁，腰际、臀部的皮肤开始溃烂，血压下降，心音减弱，呼吸渐缓；继而神志不清，言语乏力。在已气若游丝之际，忽然回光返照。他从沉睡中醒来，伸出了三根手指。陪侍者们猜测：要交代三件后事？先生摇头；三民主义？先生摇头；三公子于中令？（半年前举债出国留学）先生还是摇头。人们无从辨猜。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驾鹤而去，有人忽然悟出：先生的那个“三”，指的是故土三原县呀！

据陪侍者云，于右任在病重时曾试写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撕，撕了写，结果一个字也没留下。鉴此，治丧委员会将于右任1962年病危时写的《国殇》（即《望大陆》）视作他的遗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① 张昌华，南京人。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理事，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出版过散文随笔集《书香人和》、《走近大家》、《青瓷碎片》和《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等。

于右任这啼血的诗篇，已为炎黄子孙广为传颂。他眷故土、思统一的爱国情怀，必将与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一样，成为千古绝唱。陆铿^②说：“能够为两岸人民共同尊敬的人当然是孙中山先生。除孙中山先生之外，恐怕就要数于右任先生了。”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③批驳钱基博^④《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欲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之意），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⑤。于右



青年于右任

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

院院长。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

^② 陆铿（1919—2008），号“大声”，笔名陈棘菽，云南保山人。曾任《中央日报》的副总编兼采访部主任，资深的名记者、美国华文新闻界著名老报人，中国自有广播以来的第一个电台记者。

^③ 《新民丛报》：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④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

^⑤ 震旦学院：1903年2月27日由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马相伯为创始校长。1905年震旦学院因外籍传教士南从周篡夺校政发生学潮，130名学生愤然离校，拥戴马相伯另立新校；退学学生公推于右任、叶仲裕等7人为干事，商议新校创建办法。1905年，马相伯、叶仲裕等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和熊希龄等28人为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是年中秋节，民办官助的复旦公学正式开学。



《民立报》、《民吁日报》和《民呼日报》(从左至右)

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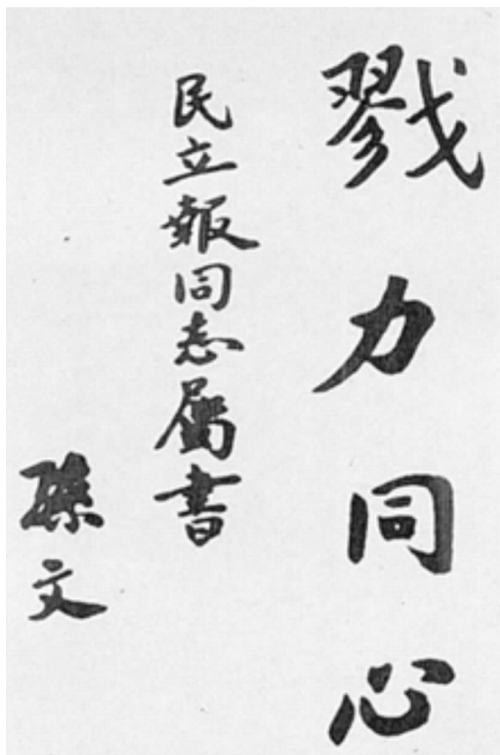
自1903年《苏报》^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⑦,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⑧。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

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⑨、吴宗慈^⑩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民呼日报》被诬停刊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又说



孙中山为《民立报》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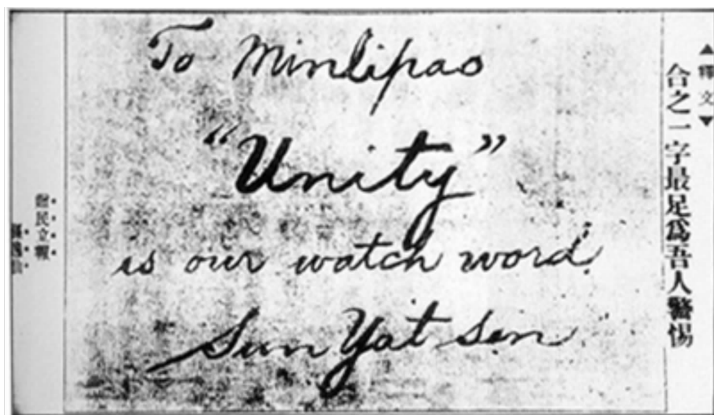
^⑥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后聘章士钊为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为该报撰稿人,其主张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是中国清代末年的著名日报。

^⑦ 《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办的第一家报纸,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

^⑧ 《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揭露贪官污吏罪行。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由于报名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故又称为“竖三民”

^⑨ 戴季陶(1891—1949),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⑩ 吴宗慈(1879—1951),字蔼林,号哀灵子,江西南丰县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孙中山为《民立报》的英文题词

“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①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一烧饼铺求助，铺主听到于右任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缙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②，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③、邵力子、叶楚伦^④、马君武^⑤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

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被誉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

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人们说：“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诗言志书咏魂

于右任擅歌赋，长诗词。他的诗作最大特点是贴合时代，亲近人民，贴近生活。

他最早出版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对故国山河之恋溢满字里行间。他说：“少年作品，过火话太多”，但“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他早年的一组“杂感”诗，直斥清廷的腐败，揭露其横征暴敛、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于右任在《署中狗》中，直喻清吏为狗。诗云：

署中豺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

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

寒门出身的于右任，素来关心民众的疾苦。“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上庐山时，他目睹轿

^① 范鸿仙(1882—1914)，名光启，笔名解人，安徽省合肥人。曾任《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编辑，后长期编辑《民立报》，倡导革命。

^② 《民立报》：中华民国成立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出版的报纸，1910年10月11日创刊，前身为于右任等办的《民吁日报》和《民吁日报》。

^③ 张季鸾(1888—1942)，名炽章，祖籍陕西榆林。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④ 叶楚伦(1887—1946)，原名单叶，宗源，以字行，别字(笔名)小凤，江苏吴县人。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

^⑤ 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又名同，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广西桂林人。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国立广西大学首任校长。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名师风采

夫脚步的沉重,耳闻其悲哀的叹息,体恤其内心的煎熬,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写下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

上山不易下山难,劳苦舆夫莫怨天。

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

抗战岁月,生灵涂炭。于右任亲往战地视察,目睹战火中孤儿流落街头的惨状。他嘱地方当局要妥善安置,自己更夜不能寐,写下《战场的孤儿》四首(此选一),诗云:

举国愁兵火,流亡何处归?

孤儿点点泪,湿透母亲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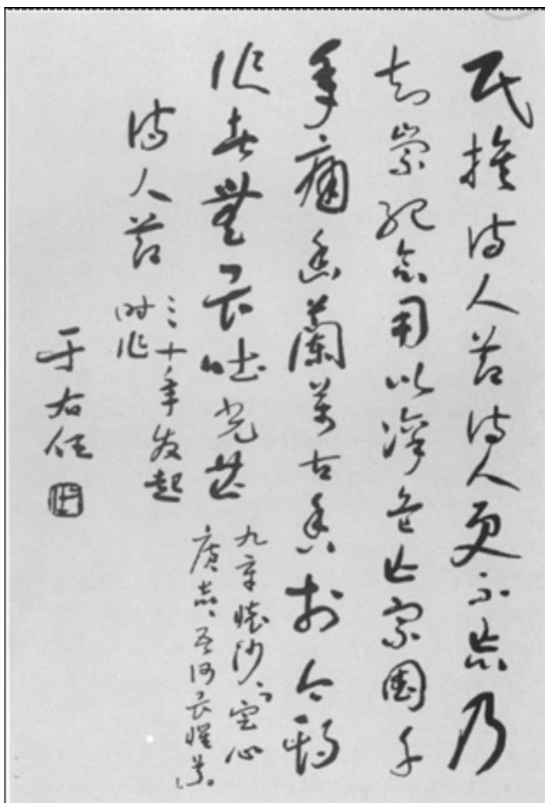
1941年,于右任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一起提出以端午节为诗人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用以懔危亡”。冯玉祥、郭沫若、茅盾等出席了大会,于右任担任大会主席,并赋《诗人节》一首:

民族诗人节,诗人更不忘。

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

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

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



1941年端午节于右任赋诗《诗人节》



晚年于右任(摄于青田街寓所书房)

即使是于右任抒发个人生活经历的诗篇,也都充满着革命精神。当年,他被升允通缉“,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上海途经南京时,拜谒明孝陵写下《孝陵》: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为向民众宣传革命,于右任早期还写过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1920年左右,他写了篇跑旱船秧歌,利用传统的“十二月歌”曲调,用地方俚语宣传民主思想,弘扬爱国精神,深受群众欢迎:

正月里来正月正,吉利的话儿说几声,

中华民国是民主,民权有了就太平。

地方自治办得好,寻点儿快活玩花灯。

……

腊月里来梅花放,家家商号都收账,

乡时人儿趁冬闲,腊八会上逛一逛。

把好话奉献大家听,如今世事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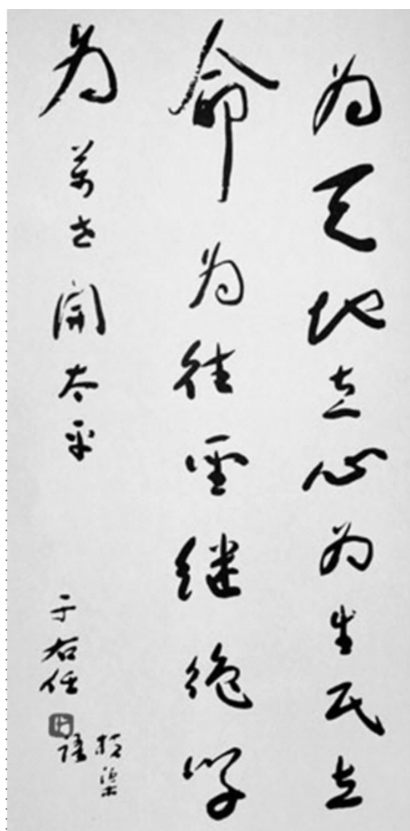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重民权,国民责任你莫忘,你莫忘!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于右任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1946年他应时为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之邀访问新疆,登上天山,诗兴遑飞,写下了歌咏天山自然风光的《天山》两绝。参加新疆各族庆祝和平大会,目睹民族团结气氛,挥毫写了一曲《大石调·青杏子——迪化和平大会后作》:

大地现光明,睹天山洁白层层。

何人创建新新生命?

和平万岁,和平万岁,万岁和平!



于右任书

于右任的经典作品，广为炎黄子孙所传颂的当属他的怀念故土、亲人，期盼海峡两岸统一的《鸡鸣曲》、《怀念大陆》、《忆内子高仲林》和那首千古绝唱《国殇》了。

他在《鸡鸣曲》中抒发了两岸鸡鸣相闻，却故旧亲人不能晤聚的悲哀：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

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

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

1962年，于右任去台13年，在他83岁生日那天写了《怀念大陆》，发出“河山何日得珠还”的感慨：

巢空子母三春鸟，石烂鸳鸯七志齐。

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

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

十年种得蓬莱水，投入家山一泫然。

于右任期冀能活百岁，想回大陆晤聚亲朋，更想他的发妻高仲林。在与高结婚60周年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脉感夫人的

手温与心跳，回味一生聚少离多的悲剧，笔下淌出了《忆内子高仲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2年，于右任患病住院，面对两岸对峙多年的现实，他只能长歌当哭，在绝望与悲愤中写了带有遗嘱性质的《国殇》，那当是他此类作品经典中的经典了。

于右任一生留下诗、词、歌、曲达千首之多。有评家说：“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

于右任多才，是诗人，也是书法大师。他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派。一台湾书法评论家评论于右任的字时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话。”

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贩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于右任编定的《标准草书》，修订了9次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他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

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品,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

(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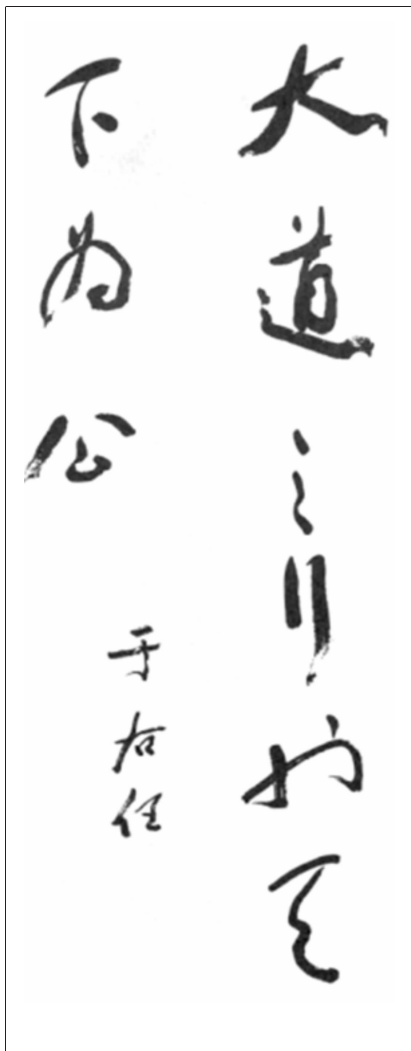
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

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



于右任书

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

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螳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颂:“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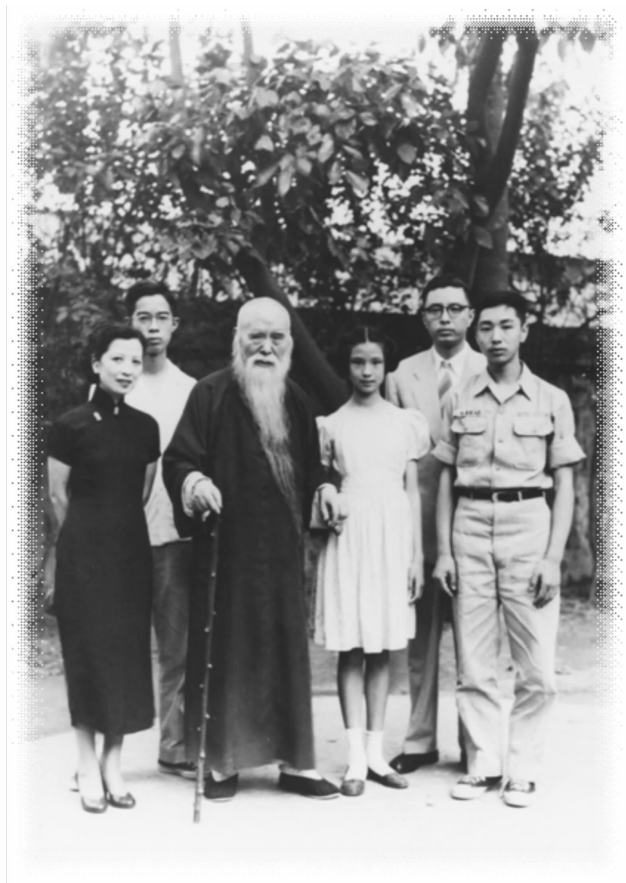
文章摘自:

[1] 张昌华. 一蓑烟雨任平生[J]. 决策与信息(人生决策版), 2008(12):47—51.

图片来源:

- [1] 于右任像,青年于右任,1941年端午节于右任诗人节赋诗,于右任书法(两幅)和于右任与家人的合影共6幅图片资料来自于右任文化网。
- [2] 《民立报》、《民吁日报》和《民呼日报》,孙中山为《民立报》题词和孙中山为《民立报》的英文题词共3幅图片资料来自于网络图片。
- [3] 晚年于右任(摄于青田街寓所书房)图片资料来自于千古一草圣——于右任的书法世界网站。

(责任编辑 朱文婉)



于右任(一排左二)与家人的合影

折冲樽俎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

□文/马云飞

编者按：邵力子(1882——1967)，初名景奎，学名闻泰，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1902年中举，同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就读，后转入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1906年赴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加入同盟会。1907年参与创办《神州日报》，开始报人生涯。此后又参与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在他及叶楚傖等筹备下，在我国最早报道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各项新政策影响最大的副刊《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1920年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并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跨党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1926年，按照中共中央决议，退出共产党。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现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甘肃省及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5年参与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复旦大学复员东迁后，与卢作孚、于右任等在重庆北碚夏坝利用所遗校舍创办私立相辉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后继第一任校董于右任先生出任私立相辉学院第二任董事长。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1956年出任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与邵飘萍在我国近代新闻史合称“浙江二邵”；他是复旦中国文学科的开拓者；他是我国提倡妇女解放的先驱；他在我国首倡实行“生育节制”；他身跨两党，成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位“特殊党员”和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位“特殊官员”；他一生反对封建专制，力倡民主、和平，主张国共一家，并致力于国共第一、二次合作，被世人尊称为“爱国和平老人”。

90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有一位重要人物为会议的召开出谋划策忙前忙后而不亦乐乎，虽然没有正式列入代表名单，却参加了筹建中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就是爱国民主人士、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

弃仕途 投革命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陶堰乡邵家溇村。幼年时，邵力子受叔父邵莲坡影响，阅读了大量历史方面的书籍，从中感受到了古代先贤



1966年4月,邵力子在其书房里录音时的留影

们的爱国事迹,内心深处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这种激情,成为激励和推动他一生前进的精神力量。

1898年,17岁的邵力子第一次到上海,入新式学堂学习。大上海的繁华在给他以新奇、开阔眼界等感受的同时,也给他以深深的民族耻辱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他深深感到:中国要振兴,就必须改革,而他目前就是要放弃仕考。后来,因不忍辜负叔父及婶娘的期望,他于1902年到杭州应科考,中举人第67名,得“文魁”匾一块。此后,便彻底放弃仕途,再次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特班”就读。在特班总教习蔡元培^①的帮助下,他首次阅读了《民约论》、《万法精理》、《天演论》等名著,革命思想从中得到启蒙,内心燃起了对自由与民主的强烈渴望。

1904年初,日俄战争一触即发。这个以谋求在华最大利益为目的的争执激起了中国所有爱国志士的愤怒与抗议。2月5日,邵力子首次公开撰文,痛快淋漓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鲸吞瓜分。文章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使他看到了舆论的力量,引发了他对新闻工作的兴趣,成为他以后18

年从事办报事业的最初契机。

1906年,邵力子与于右任^②等人东渡日本,欲“步泰西之法”而拯救中国。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一番交谈之后,邵、于二人当场要求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事业,受到了孙中山的热情欢迎。

1907年,邵力子与于右任回到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在“发刊词”中提出“三个主义”,即“神州社会主义”、“神州国家主义”、“神州帝国主义”,点出了报纸的宗旨是推翻封建王朝,唤醒国民民族意识,重振中华之威严。报纸以宣传革命主张、报道革命事迹等内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成为当时上海销路最广、影响极大的一份报纸。孙中山曾函示要求把它办成革命的机关报。当时,革命性质的报刊极易受到



青年时代的邵力子

^① 蔡元培(1868—1940),初字鹤卿,又字子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清光绪进士。1902年同章炳麟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1904年先后主编《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战争中在香港病逝。参见《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

^②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清末举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参与创办复旦大学。1907年起先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1912年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长、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学。1927年起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等。1949年春支持国共和谈,谋求和平统一。后去台湾,任“检察院”院长。长于书法、诗词,著有《右仁诗存》等。参见《辞海》全册第67页。



藏于复旦大学校史馆的

1919年邵力子敲响的上海“五四”第一钟

当局的查封。《神州日报》遭遇火灾后,邵力子等人又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呼日报》被查封后,又办起《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后,他就又和于右任等创办了《民立报》。力子正是其办《民立报》时开始采用的笔名,“取义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游子谓游惰之人,力子谓勤劳之人,其后取消名号,即用力子为名”。他说,我们“呼”之不成则“吁”,“吁”之不准则“立”。表现了他不畏压迫、迎难而上的革命气魄。毛泽东曾说,《民立报》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充满了“富有刺激性的”革命材料。

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邵力子极度喜悦和兴奋。1912年8月12日,邵力子加入了国民党。但很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的频频失败,使邵力子开始思索未来的革命道路。

强烈的革命热情使邵力子密切关注一切进步的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利用手中的报纸大量报导俄国的革命盛况,在第一时间内于上海赶写了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闻报道,并亲自前往他任中文系主任的复旦大学,撞响大钟,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即席作报告,讲时事,揭露北洋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使复旦学生在上海第一个举起了

“五四”的大旗,走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对当时的斗争性质作了深入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邵力子提出了“根本改造社会”的口号。邵力子自己也从五四运动中逐渐觉悟:要改造人,必须先改造社会制度。五四运动使他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豁然开朗,正如他自己所说,“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主编《觉悟》 参与建党

邵力子是20世纪上半世纪我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他一生参与主办和编辑的报刊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他的主导下,以及在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觉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被称为当时全



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国报纸中的四大副刊之一”。它与周恩来在天津主编的《觉悟》月刊不谋而同名,南北辉映,唤醒了民众的觉悟,给社会以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曾称当时的社会为“觉悟”时代。

《觉悟》以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而著称。从发刊第三天起,它就连续发表李达^③所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以后又不断发表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

^③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代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1922年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脱党。1949年重新入党。建国后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学说的论著,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当孙中山因想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而遭到反对时,邵力子在《觉悟》上集中、大量且有针对性地刊发有关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各种政策、方针、苏联革命经验等方面的文章,对孙中山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起到了推动和催化作用。

《觉悟》是教育指导团结新青年的园地。《觉悟》通过评论、讲演、小说、通信、随感录等多种方式,通过与读者之间的信件交流、研究、商榷、论辩等途径,与读者交流解决各种问题,在社会尤其是在青年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青年把《觉悟》当作自己的喉舌,把邵力子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在信里写上“力子呀力子”的台头,“邵力子”三字成了当时青年中反对封建婚姻的标志。邵力子还通过《觉悟》不断发出解放妇女的呼声。《觉悟》上开辟的邵力子信箱,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史上“三大信箱”之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因大量报道罢工事件,《觉悟》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恼怒,邵力子等人被迫离开上海。

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人之一。1920年4月,邵力子与陈独秀^④等人在上海与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⑤,共同研究了中国建党的问题。5月间,邵力子、陈望道^⑥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边做理论研究,一边组织和指导工人运动实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研究会转化为上海共产党(后来又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不经常参加组织生活,也不公开身份。次年7月,他还和张国焘^⑦一起为迎接中共一大的召开



1925年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邵力子

^④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突庵,安徽怀宁人。1915年创办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刊物《青年》(1916年改名《新青年》)。1918年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参加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职,并受到党内批判。1931年成为托派组织的总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1942年5月因心脏病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去世。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⑤ 维经斯基(1893—1953),原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俄国维切布斯克人。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同年3月来华帮助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参加中共“五大”。7月回国后到全俄农业合作社工作至1929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803页。

^⑥ 陈望道(1890—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1919年从事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0年翻译出版我国第一个译本《共产党宣言》。同年参加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后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校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著有《修辞学发凡》等,并编有《陈望道文集》。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⑦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5年历任中共江西、湖北省委书记。1935年3月率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同年6月自立“中央”,分裂红军。1936年被迫取消伪中央。1938年叛变革命,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1949年寓居香港。后移居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病死。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而负责组织筹备和联络工作。他公开宣称,自己“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直至1925年到黄埔军校任职后,他才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26年,他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之前,为了符合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国共双方各派一个代表的要求,他听从中共上级组织安排,宣布退出共产党,以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体现了他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主的宽广胸怀。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邵力子极度痛苦。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之后,他向蒋当面提出,反对他的“分共”政策,主张以政治途径“解决分歧”。但由于对蒋还抱有幻想,他没有与蒋彻底分离,继续在国民党内任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呼吁唤起民众,准备抗战。面对学生的爱国请愿行动,他说,“中央的同志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竟有今日的国难,应当对国民深自引咎”。他为国民政府的不积极作为感到羞愧。

坚持联共联苏 团结抗战

1933年,邵力子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⑧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在陕西,他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埋头于地方经济建设。

然而,没有国家的独立,何谈国家的发展?毛泽东不相信爱国的邵力子先生真的不再关注抗战、不再关心国共合作了。1936年9月8日,毛泽东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邵力子的这种疑问,并希望邵力子能够为国共再次合作做些事情。书信的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蒋介石游汉武帝墓

^⑧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0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在南昌被国民党特务软禁。1949年9月17日的重庆解放前夕,被蒋介石指使特务杀害。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65页。

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接到信后，邵力子心潮难平。不久，西安事变发生，邵力子与蒋介石等人一起被拘禁。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支持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且兴奋地说，“和平解决事变，是个福音，可促进团结抗日”，“惟愿抗日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他这种不以个人得失萦怀、惟以国家和平为首任的态度，使他反被诬为事变的参与者，名义上蒋命他去帮助被囚禁的张学良读书、“洗脑子”，实际上是对西安事变补过。不久，他还被免去了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

1937年，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任上，他积极为团结抗日扩大舆论，为维持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当中共要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时，他立即表示同意，并给以多方支持，使中共在大后方有了一个极重要的宣传阵地；他在一天之内就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办完了所有手续，创了宣传部部长亲自审稿及书刊审查速度的新纪录，使之免受了特务的阻挠；他“准予发表”斯诺^⑨撰写的《毛泽东自传》，使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他还允许发表一些抨击法西斯罪恶、预言法西斯必败的文章。面对别人的

攻击，他据理力争，愤怒质问：我国正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反对同日本勾结的德意建立法西斯轴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查禁这类文章？

邵力子一向主张对苏友好。1940年1月，在于右任等人的建议下，他接替杨杰^⑩出任驻苏大使。在临去之前，邵力子对蒋介石等人良言相谏，希望他们能在国内给予充分配合，以顺利得到苏联的援助。

在苏联，邵力子不负众望，使大批苏援源源运往中国。正当他为此高兴之时，国内发生了皖南事变。面对苏方的责问，在震惊与心痛之余，邵力子一方面向蒋介石恳切陈词，晓以利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一方面在苏联竭力解释，终使苏援未因此而断。1942年他回国述职时，临行前斯大林殷切嘱咐，希望他早日回到苏联。回国后，他在多个场合作报告、或撰写文章，全面介绍苏联情况，反复重申“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积极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因此，他被国民党内反苏反共分子攻击为“苏联驻华大使”，而不是中国驻苏大使。1942年11月，他被免去驻苏大使职务。

折冲樽俎 获“和平老人”称号

邵力子一贯主张国共真诚合作，一生追求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遗余力的为促进和维护和平奔走。

1945年8月，当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进行谈判的消息传来时，邵力子心潮澎湃，忧喜难平。明知道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实现和平，但他还是真心希望事情能有戏剧性的变化。他说：“国共合作本是孙先生的坚定主张。历史也证明，有了国共合作，对内才有革命的胜利（指北伐战争），对外才有反侵略的胜利（指抗日战争）。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

^⑨ 斯诺(1905—1972)，美国人。1926年密苏里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1927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访问中国陕北根据地后，写成《中国上空的红星》（即《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的长征。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803页。

^⑩ 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6年随军北伐。此后历任师长、军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委。1949年9月离昆明赴北平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于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于香港寓所。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1945年8月28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图为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张澜(左一)、邵力子(左二)、郭沫若(左三)、傅学文(左四)和张治中(左五)等前往欢迎

在整个和谈期间,邵力子参加了各种有关和谈的大大小的会议。他从大局出发,不因一己之私而谋事。遇有双方意见不一的时候,面对蒋介石的责难,他常常是既要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要考虑尽量满足中共代表的要求。他几度处境尴尬,举步维艰,但始终不丧失信心,积极地为双方寻找协调解决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早实现国内的和平。因为,这个国家太需要和平了!经过几多努力,双方终于达成有关协议,《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于10月10日举行签字仪式,和谈终于结出成果。由于在这次和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人对邵力子以“和平老人”的美誉相称。

然而好景不长。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邵力子等人的心血终于付之东流。邵力子异常难过,他拒绝参加伪“国大”,不避嫌疑到机场为因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而离开的周恩来送行。他还为董必武^①题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表达了他决不

放弃追求和平的决心。

所以,一有实现和平的希望,邵力子就努力奔走。当李宗仁^②代理总统后,在上海组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时,他应邀参加,与毛泽东、周恩来详细会谈,一切以实现和平为首位思考;当国民党当局组建“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时,他也应邀前往。他说,未能早见和平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然而,当他看到国民党当局只是在玩和平游戏、而非真正追求平时,他选择了留在北平,

留下来参加新政协。他不仅自己要与国民党当局决裂,而且联络其他国民党人士与国民党当局决裂。他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去留问题,是要多发动一些人来参加新政权的问题”。足见他胸怀远大,时刻为国、为民族未来而着想。



1945年邵力子参与签订的《双十协定》

^① 董必武(1886—1975),名贤琮,又名用威,号壁伍,湖北黄安人。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1932年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5年病逝。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663页。

^②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28年任国民党武汉政府分会副主席。后历任安徽省主席及安徽省保安司令。1938年组织指挥台儿庄战役。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任代总统。1965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1969年1月在北京病逝。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1949年邵力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提倡计划生育 切盼祖国统一

建国后,邵力子不顾自己年高体衰,积极参政议政,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计划生育”就是其中之一。也许一提起计划生育,谁都会想到马寅初^⑬和他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的刚直不阿,坚持计划生育的真理,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却不知道,邵力子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全力支持者。即使在马寅初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时,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见风转舵,销声匿迹。邵力子是新中国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而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当他担任《觉悟》副刊主编的时候,就从解放妇女的角度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并

在《觉悟》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1922年5月,他还在向警予^⑭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能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消费需求与物质财富的增长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邵力子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在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同时,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必须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1953年冬天,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1954年9月,在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反应。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全国各地写信来质疑和询问的人很多。他决定公开讨论这个问题。12月19日,邵力子以《关于传播避孕常识》为题,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要求废弃惩罚堕胎的法律,宣传避孕的医学知识,提供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品。为使提议具有科学根据,1955年春天,他还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⑮一起找到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希望马老根据他们提供的调查材料,早日拿出一个有利于



1955年马寅初(左)、李德全(中)和邵力子(右)
在马寅初家中就计划生育问题进行交谈

^⑬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战争时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等。建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等。1982年在北京病逝。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⑭ 向警予(1895—1928),女,原名俊贤,笔名振宇,湖南溆浦人。1915年毕业于周南女校。1919年参加新民学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并主编《妇女周报》。1928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同年5月1日在汉口就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会见当年的黄埔校友,前排中立者为邵力子

国计民生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张。后来他还写就《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案》的提案提交人大,并“请审议后送卫生领导机构采择施行”。他还在各种场合作报告,详细阐释实行计划生育的利弊,并自费印刷了一批《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到处分赠,并动员亲属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即使后来当他因计划生育问题受到批判时,他也不在乎,仍然继续宣传。在他看来,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遗憾的是,他的提议当时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直到1978年,国家才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当时已过了二十多年,中国人口已经增加了三亿。

邵力子晚年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曾对夫人傅学文^⑩说:“我奔波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国安民康,至今海峡两岸父老兄弟姐妹还不能欢聚,共享天伦,真让人寝不安枕!”在他生命的最后18年,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老成为国,感人至深。他

曾说,自己愿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指引下,“尽力联系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团结在政府的周围,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应有的作用”。

对祖国早日统一的强烈渴望使邵力子不顾耄耋高龄、衰弱之躯,他通过报纸、电台等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和在台湾及海外的亲朋故交做争取和宣传工作,共商台湾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利用春节、中秋、孙中山诞辰、忌日等重大节日和政协会议等重要场合,写文章和发表谈话,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认清前途,为早日实现两岸统一作贡献。他说,“因为我们都同样崇仰孙中山

先生的崇高品德、渊博思想和不朽功业”,“我们应当在孙中山先生爱国精神的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千般诚意,忠心为国,即使是在“左”倾思潮泛滥时期,也不曾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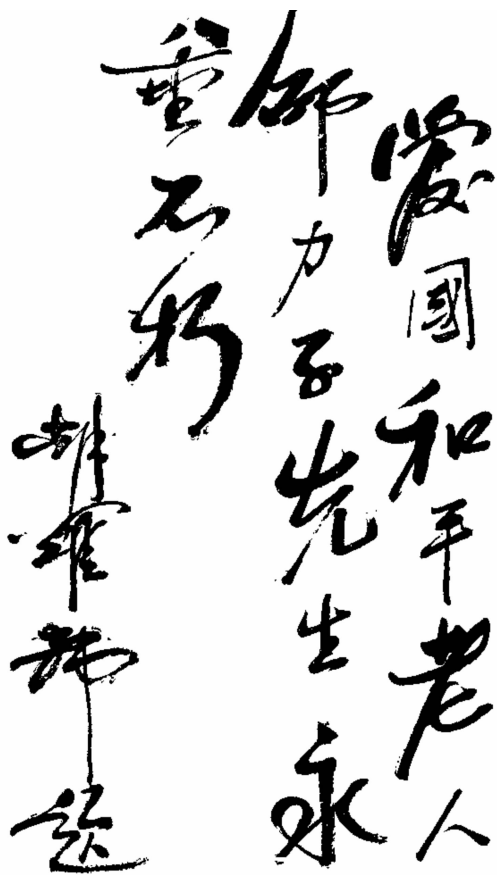
1967年12月25日,86岁的邵力子走完了他精彩、辉煌的一生,留给后人更多的是更多的思索与怀念。这个一生都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老人,在生命



1960年7月邵力子与夫人傅学文在北戴河海滩

^⑩ 李德全(1896—1972),北京通县人。冯玉祥夫人。1925年创办北京求知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创办中国妇女联谊会并任主席。1948年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1949年3月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1972年在北京病逝。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德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81页。

^⑪ 傅学文(1903—1992),江苏宜兴人。1927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长期从事幼小教育和保健事业,先后创办陕西省助产士学校、南京力学小学、北平培新幼儿园。1939年任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华妇女联谊会北京分会会长,全国妇联第四、五届执委,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常委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参见华夏经纬网大陆人物傅学文介绍。



胡耀邦题词“爱国和平老人邵力子先生永垂不朽”

的最后时刻,牵挂的仍然是祖国尚未统一、国家尚未富强。回顾邵力子的一生,他的奋斗道路是不平坦的,他的思想、精神和作风也留下了新旧交错的痕迹,但从他为人、立身、出世种种方面看,毅然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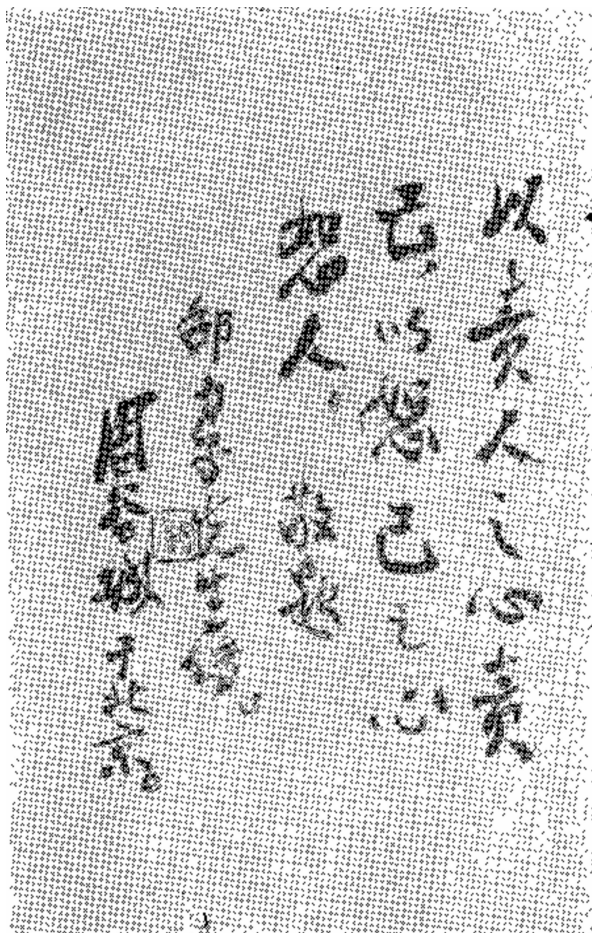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1] 朱顺佐.邵力子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 [2]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和平老人邵力子[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 [3] 民主战士、和平老人——邵力子.参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民革文件 http://founder.china.cn/minge/index/txt/2010-12/30/content_3930247.htm.

[4] 邵力子.参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民国人物 http://www.minge.gov.cn/txt/2008-09/27/content_2496665.htm.

[5] 裴兰君.和平老人邵力子[J].团结,2008,(4).
文章在成文过程中所引用的照片除“五四”第一钟和“双十协定”外,其余均来自《邵力子传》和《和平老人邵力子》前言页插图。

(责任编辑 李亚勃)



《邵力子传》一书中周谷城的题词:“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于右任、邵力子 与私立相辉学院

□文/马云飞 朱文婉

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私立相辉学院与于右任及邵力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位先生曾先后分别任私立相辉学院的第一任和第二任董事长。1946年秋，于右任、邵力子和卢作孚^①等筹建了私立相辉学院。

1937年抗战爆发，在战火纷飞中，复旦大学^②师生辗转5000余里，上庐山、赴武汉、经九江、奔宜昌，辗转迁移。1938年2月，最终



1937年12月复旦师生到达重庆码头后的合影

在重庆北碚夏坝建校复课，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之下坚持着中华民族的高等教育事业。夏坝的“夏”原

^①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并任公司总经理。后任国民党政府川江航运管理处长、四川省建设厅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继续任民生公司总经理。1952年在重庆病逝。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② 复旦大学：1903年马相伯创建了震旦学院，1905年震旦学院因外籍传教士南从周篡夺校政发生学潮，130名学生愤然离校拥戴马相伯另立新校，退学学生公推于右任、叶仲裕等7人为干事，商议新校创建办法。1905年，马相伯、叶仲裕等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为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是年中秋节，民办官助的复旦公学正式开学。1917年，复旦公学升格，改校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创办大学本科，李登辉为复旦大学首任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至重庆北碚，于1941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1946年6月，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渝期间，共毕业了近3000名学生。



1945年夏,农学院同学返回上海前
在夏坝农场合影

为上下的“下”,陈望道^③先生取谐音,更名为夏坝,寓意华夏。当时夏坝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并称

“文化三坝”。在北碚的八年,复旦先后增设了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学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并设置了科学馆、新闻馆、商科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室。1940年秋,复旦渝校建立农学院。1941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渝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④任校长。学校坚持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按需办学,至此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生近2000人,教职员350多人,工友230多人。其中相伯图书馆藏书30000多册,编刊有《复旦学报》及《复旦丛书》多种。广大师生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大旗,积极进入抗战洪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菊社、话剧社、文摘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进步团体,创办了《文摘》、《夏坝风》等刊物和壁报。由于学校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解放”的方针,吸引了如陈望道、周谷城^⑤、孙寒冰^⑥、曹禺^⑦、胡风^⑧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各地的热血青年前来任教和学习。学校进步力量大,抗战气氛浓,被誉为夏坝“小延安”。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8月,复旦大学渝校的

^③ 陈望道(1890—1977),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1919年从事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0年翻译出版我国第一个译本《共产党宣言》。同年参加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后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校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著有《修辞学发凡》等,并编有《陈望道文集》。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④ 吴南轩(1893—1980),原名冕,字行,江苏仪征人。1919年赴美,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处任职。1936年始任复旦大学校长。1942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1950年受聘为美国麻省国际学院教授。1966年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1980年病逝于台北。著有《儿童心理卫生》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⑤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1927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等撰稿,并在中国公学等校兼课。1930年秋任中山大学教授。1931年秋任暨南大学教授。1943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史学会第一任执行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第八、九届中央副主席、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名誉主席等。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政治史》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之周谷城介绍。

^⑥ 孙寒冰(1902—1940),江苏南汇人。早年入华盛顿大学。后入哈佛大学。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国立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等。曾创办《文摘》杂志,并任黎明书局总编辑。1940年6月日机轰炸重庆时罹难。著有《合作主义》等,翻译有《社会科学大纲》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⑦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笔名曹禺,湖北潜江人。著名剧作家。1934年在《文学季刊》发表多幕话剧《雷雨》后震动戏剧界。1936年任教于复旦大学。1946年赴美。1949年归国后历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1988年11月被选为当选中国文联执行主席。部分参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页和汉语网曹禺简介。

^⑧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3年先后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著有《文艺与生活》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师生回到上海。同年秋,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⑨同复旦同学会重庆分会校友商定,为培养英才,利用所遗校舍,在此旧址筹办一所学校,并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⑩和校长李登辉^⑪,定名相辉学院。邵力子先生当时即是复旦同学会重庆分会校友之一。有人评论说相辉学院是复旦大学内迁重庆而孵化出的新的私立高校,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初创时期高校之间千丝万缕的血缘和学缘关系。

相辉学院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作董事长,其他担任董事的还有卢作孚和邵力子等。担任院长的是



于右任题国立复旦大学校牌

复旦大学训导长许逢熙教授。学院暂设农艺、文史、外文、经济、银行会计五系,并聘请知名学者任教,当时有学生1880多人,教职员133人,教授有吴宓^⑫、方敬^⑬、金企渊、张默生^⑭等知名人士。并于同年9月招生。1947年10月,国民政府下文批准并正式定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设文史、外文、法律、经济四系,附设农艺系。

相辉学院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首任董事长,其缘由不得不提及当年复旦大学在渝改名一事。随着抗战深入,内地物价飞涨,学校负担甚重,又缺少经济来源,长此以往,难以为继。于是,在渝复旦校

^⑨ 章益(1901—1986),字友三,又号雯文,安徽滁县人。1924年赴美留学。1927年回国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期间曾任教育部司长。1952年后山东师范学院教授,以迄逝世。译有《亨利六世》等,散著见解放前《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参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43页。

^⑩ 马相伯(1840—1939),字良,江苏丹徒人。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1907年参加政闻社。曾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39年在越南谅山病逝。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⑪ 李登辉(1873—1947),字腾飞,福建厦门人。1905年受聘于复旦公学教授兼任教务长。1912年后任校长。1936年退休。后曾任中华书局英文总编辑。1947年7月因肺炎病逝。著有《文化英文读本》、《李氏英语文范》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⑫ 吴宓(1894—1978),原名玉衡,7岁改名陀曼,17岁改今名,字雨生、雨僧,别号空轩,陕西泾阳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至终。卒于泾阳。著有《雨僧诗文集》、《吴宓诗集》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⑬ 方敬(1914—1996),重庆万州人。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曾与何其芳、卞之琳合编《工作》半月刊。1944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任教于贵州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重庆大学、相辉文法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1950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创办并领导《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现《西南大学学报》),参加《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1952年参加亚太和平会议工作。《西南大学记忆》2010年第一期《名师风采》专栏对方敬生平、学术及贡献进行了专门介绍。参见《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名录》(《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名录》编写组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1页。

^⑭ 张默生(1895—1979),山东临淄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复旦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相辉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民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平反。同年9月病逝。著有《庄子新释》等,选编有《先秦诸子文选》等。参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李盛平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



1943年,于右任(中)、邵力子(左)和吴南轩(右)在北碚登辉堂奠基仪式上

董于1939年和1940年先后两次谋求改为国立,但由于李登辉和其他在沪校董的反对未果。后以于右任为首在嘉陵宾馆集会商讨对策决定建议改复旦为国立,以求得到政府的资助。当此时,国民政府又拟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更名为“江苏大学”,无形中将“复旦”消弭其中。消息一经传出,复旦师生一致反对,认为复旦历史悠久,具有革命传统,坚决要求保留“复旦”校名。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系政府中官位最高的校友,他全力支持复旦师生的要求。于是站在复旦校董一边,面对当局,游说奔走,频繁活动。

1941年9月17日,于右任在重庆嘉陵宾馆,亲自主持在渝复旦校董会议,具体商定了复旦改为国立的条件和保留校名等问题,校董同仁一致表示赞同。10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开会,于右任发言:“复旦大学拟改国立一事,早有报告送陈(立夫)部长,

现在是否讨论一下?”于是陈立夫将复旦的报告简述一遍。这样,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并保留校名一事,得以顺利通过而定案。1941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及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名发布命令: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于右任高兴地泼墨手书“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悬于重庆北碚该校门楣。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校牌依然是于右任手书。

邵力子先生在筹建相辉学院的过程中积极献言献策,尽自己最大努力协助于右任和卢作孚等筹建人士。在筹建经费、学院规章制度的制定、学院发展



登辉堂

名师风采

特色、教育理念以及学院系科的设置及其发展方面可谓用苦良多。他力争教育普及、主张教育独立、提倡能动的教育。先生在教育上一直追求“建国人才，备为世用”，他说办学育才兴科学是“要为真正的人民谋普遍的幸福”。这一思想也一直贯穿在他参与创办相辉学院的过程中，他提倡不分男女，不分家庭贫富一样入学，一样对待。他在积极参与创办相辉学院的过程中对新教育制度进行大胆的探索：在学院教育方向方面，他坚持教育与爱国相结合，革命救国的原则，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学科设置方面，他主张适应社会需要，教育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在校务管理方面，他主张推行“学生自治”；在师资队伍方面，他建议组建有真才实学而又有革命抱负的教师队伍，他主张废除“师道尊严”，提倡师生教学相长；在课堂教学方面，他说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学生应把学到的东西无保留地贡献社会，切实做到学习不忘革命，应为革命努力学习。同时他主张课堂应冲破旧学校的“森严堂规”，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意见展开争论。他的这些思想、建议及主张对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拟筹建两所新的学院，一是将川东教育学院的国文、教育、数学、英文、史地、博物等6个系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建西南师范学院；一是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农艺、园艺、农产制造）作为主干，筹建西南农学院。于是在当时重庆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大门上挂出了

两块牌子，一是西南师范学院，一是西南农学院。1950年9月，西南文教部确定位于北碚的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所在地（北碚夏坝）为西南农学院校址。1950年11月27日，西南农学院正式成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及其专修科连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以及其他高校农艺系一道，并入了西南农学院。

1954年西南农学院由北碚夏坝迁入北碚天生桥新校址办学。1985年10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改名为西南农业大学。2001年，其再与四川畜牧兽医学院、中科院柑橘研究所合并为新的西南农大。2005年西南农业大学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成了现在的西南大学。

站在经过翻修的相辉学院旧址外，从相辉学院到今日之西南大学，沧桑巨变让人感慨万千。

月及中天，嘉陵江上的歌声逐渐散去，从林荫道上远眺，相辉旧址还是那么宁静和厚重。相辉的每一天在日落中落下帷幕，而更光辉的明天正在孕育中……



私立相辉学院旧址纪念碑



相辉码头小道通往北碚区东阳镇私立相辉学院旧址

参考文献:

- [1] 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编. 漫游中国大学之西南大学卷[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 [2] 复旦大学校友会. 复旦人[M].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 [3] 西南大学校史研究室. 西南大学寻根(之六)——西南农学院的建立(上)[J]. 西南大学记忆, 2010, (2).
- [4] 王玉波. 试析邵力子的教育思想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3, (2).
- [5] 抗战复旦和相辉学院旧址. 牛嘶的博客 http://ruanjunnews.blog.hexun.com/17091702_d.html.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第一、二、四、五幅图片来源于《复旦人》, 第三幅图片来源于《于右任与复旦大学》(作者赵秀英), 第六、七、八幅图片均出自于拍摄。

(责任编辑 李亚勃)



编者按：翻阅历史，重拾记忆，一次历史与机遇的碰撞，重庆北碚迎来一座有重要影响的学府——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私立相辉文法学院、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这三者有怎样的关联？本期《档案拾遗》谨以清晰而珍贵的影像档案史料再现当年的历史，为您解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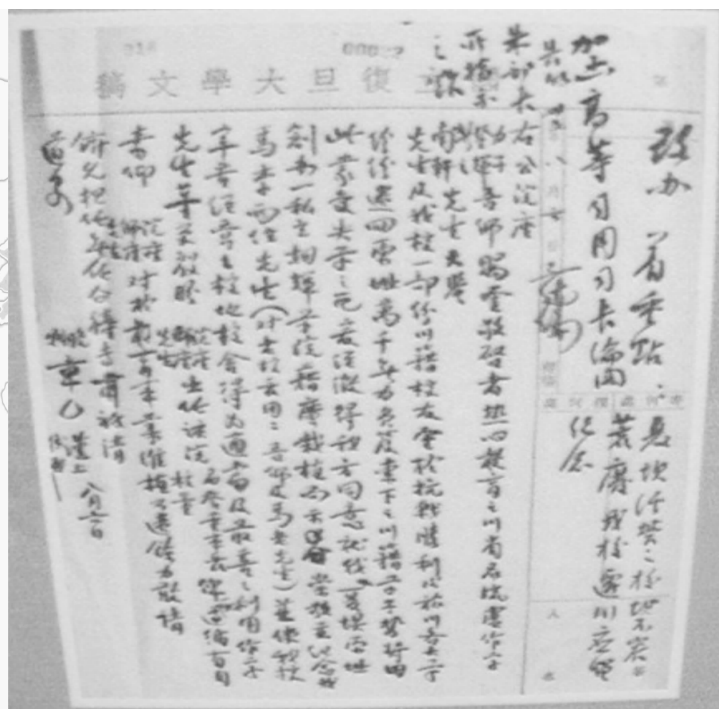
国立复旦大学校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①内迁至重庆北碚，并在夏坝选址建校。

^① 复旦大学1905年创建，原名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北碚，1941年，私立复旦大学改名国立复旦大学。

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是年7月,部分留渝教师和学生在其旧址上成立相辉学院,后改名为“私立相辉农学院”,1947年10月,又改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

私立相辉文法学院设有董事长、院长等职务,其首任董事长为于右任。



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为创办相辉学院
致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函^②

私立相輝文法學院組織概況

- 一本院設院長一人總轄全院院務由董事會聘任之
- 二本院設校務長一人協助院長處理全院院務由院長聘
- 三本院設教務訓導及總務三處每處各設主任一人兼承
- 務長主持各該處有關事宜由院長聘任之
- 四本院教務處設註冊及成績二股每股各設股長一人職員
- 院長任命之兼承院長校務長及總務處主任處理各
- 務
- 五本院訓導處設課務及齋務二股每股各設股長一人職員

私立相輝文法学院组织概况介绍^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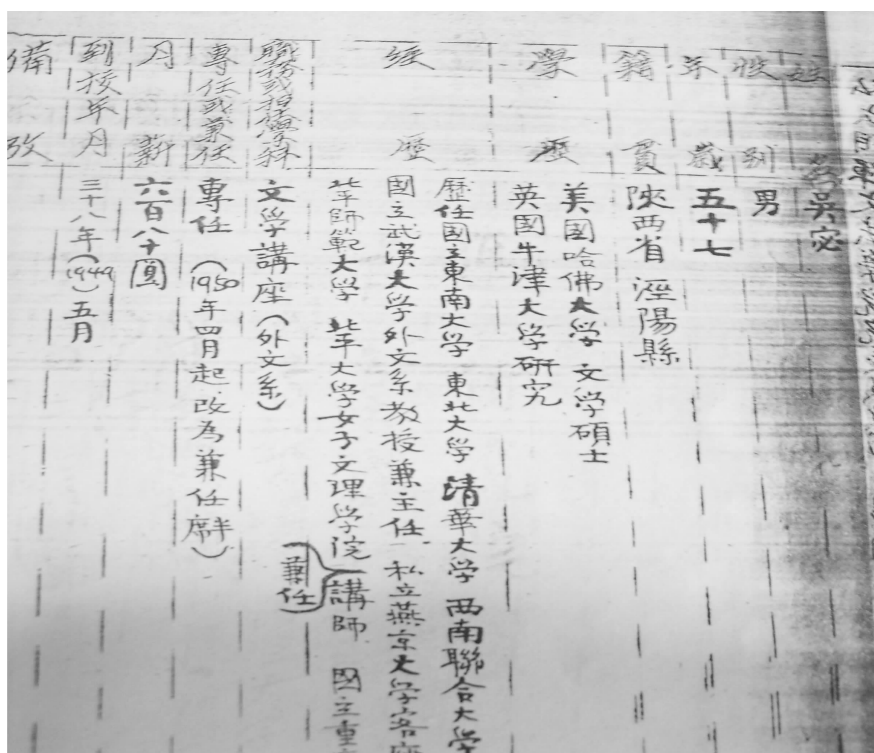


私立相輝文法学院的图书馆^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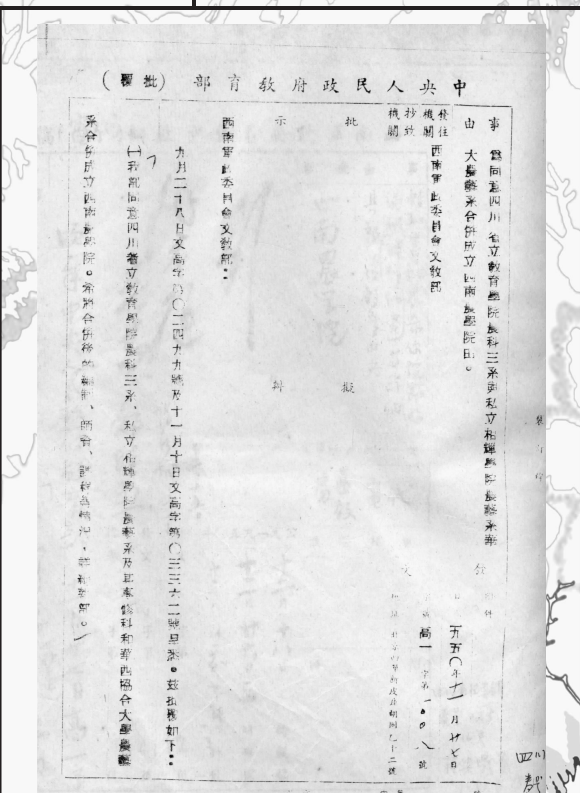
② 资料来源:重庆市北碚区夏坝复旦大学纪念馆。

③ 资料来源:重庆市北碚区夏坝复旦大学纪念馆。

④ 资料来源:重庆市北碚区夏坝复旦大学纪念馆。



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教授中不乏名师,吴宓、方敬等名师都曾在此处任教。



⑤ 资料来源:重庆市北碚区夏坝复旦大学纪念馆。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校史资料,01-校史资料-10。
 ⑦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校史资料-007。

(责任编辑:唐朵朵)

西南大学寻根(之九)

——西南师范大学的发展(上)

□文/张晓华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学校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努力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师范学校上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和建设，学校在办学规模和办学层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一、实行改革，学校发展进入新阶段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十年内乱，西南师范学院^①的发展和建设重新迎来了春天。学校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教学，改革实践教学，加强科研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 振兴教学工作

经过拨乱反正后，学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逐渐完善教学计划，加强基础课和实践课，精简必修课，增加各类选修课，强化教学管理，改



全院师生员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清除“四人帮”对学院的影响(1976年)^②

^① 1979年，西南师范学院改由教育部直接领导。1985年，西南师范学院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

^② 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76-SX122,123-1.0089。



第一批博士毕业授位仪式(1988年)^③

进教学方法,加强实践环节,教学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增加办学层次

为适应中等教育结构改革、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和地方高等院校增多的新形势,学校在坚持办好本科教育的同时,增加了办学层次和系科专业,加强了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教育、教学,办学形式也更加灵活、多样。在办学层次上,除研究生教育、普通本专科教育、成人教育外,先后举办了助教进修班、少数民族预科班、专科起点的教师本科班、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在办学形式上,除国家指令性招生计划外,增加了委托培养、自费走读、与地方或单位联合办学等形式。1985年,学校率先与攀枝花钢铁公司联合办学,在校企结合,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方面走在了前例。随着办学形式的灵活性和办学层次的的多样化,学校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1976年在校全日制

学生只有2384人,1990年发展到6914人。

2.发展研究生教育

1979年学校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5年,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入校,标志着学校研究生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1年,学校有了第一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植物学专业。^④1983年,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教学论专业。^⑤1987年,学校重新制定了各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上,注意与本科课程的衔接,加强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的学习,重视本专业学科前沿发展的掌握,加强科学和应用技术能力的培养。专业学位课程注意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⑥教学方法也进行了改进,坚持讲授、自学和讨论相结合。此外,学校还制定了《研究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职责》等文件,加强和改进研究生管理,确保了究生教育的质量。到1990年,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招收研究生的学科专业从1979年的5个扩大到了21个,在校研究生共260人,有2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中文系函授教研组认真讨论语文函授教学计划(1978年)^⑦

^③ 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88-SX122-1.0038.

^④ 关于下达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81-XZ11-27.0018.

^⑤ 关于转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的通知》的通知,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83-XZ11-56.0004.

^⑥ 一九八七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87-JX1215-1.0001.

^⑦ 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78-SX122-1.0041.

3.大力举办继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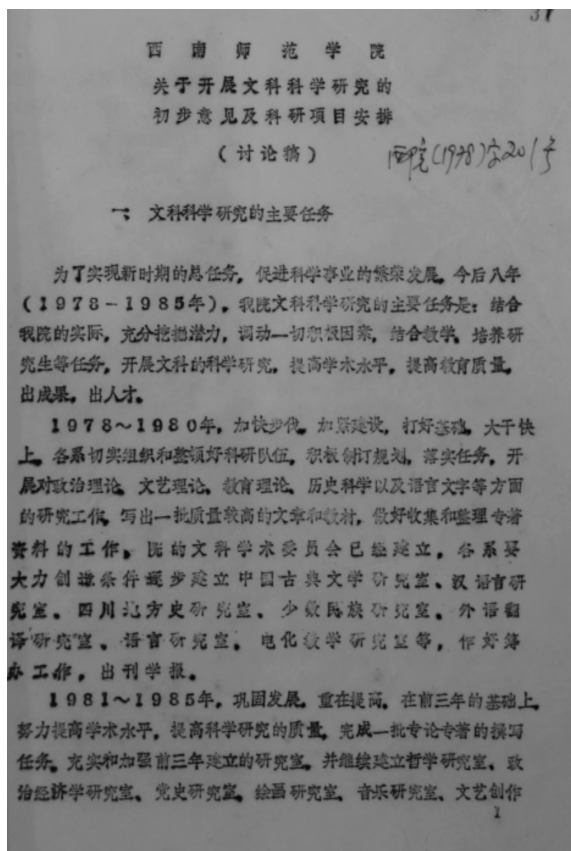
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提高干部和职工的素质,学校本着“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开展岗位培训和职业技术培训。

首先是函授教育。学校的函授学历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1979年才开始恢复招生。随着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函授教育的规模逐步扩大。到1990年,招生专业达到23个,共设有18个地区级的函授站,函授教育面覆盖了云南、贵州、四川三省18个地、市、州,在册函授生由1979年的2396人扩大到10529人。

其次是夜大学。学校的夜大学创办于1984年,其培养目标是中学教师、政工干部、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最初只开设了中文、英语等6个专业,共招收学生385人。学校逐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教材建设,紧紧抓住课堂教学、课外作业和考试三个环节,从而保证了夜大学的教学质量。^⑧到1990年,夜大学已开设了政治教育等10多个专业,共有学生792人。

再次是干部培训。1982年,学校开始举办高校干部进修班。1986年,西南师大干部进修班改名为“国家教委西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⑨干部培训中心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校内外结合的教师队伍,国家教委和省、市教委的一些负责人也来培训中心担任过教学工作。到1990年,培训中心共培训高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文教科局长以上干部2156人,为西南地区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后是师资培训。1987年,国家教委建立了国家教委西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培训中心成立以来,积极为西南地区的师专、教育学院、师范学院培训师资。到1990年,培训中心共培训高师师资863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人员不稳定的状况,为西南地区高等师范专科和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工



学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78年)^⑩

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学校在加强教学工作的同时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制定了科研发展规划,对科研管理体制、科研人才培养和使用、学术交流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广泛争取科研任务和经费,积极开辟科技市场,加强横向联系,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合作与协作,逐步开创了科研工作的新局面,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迅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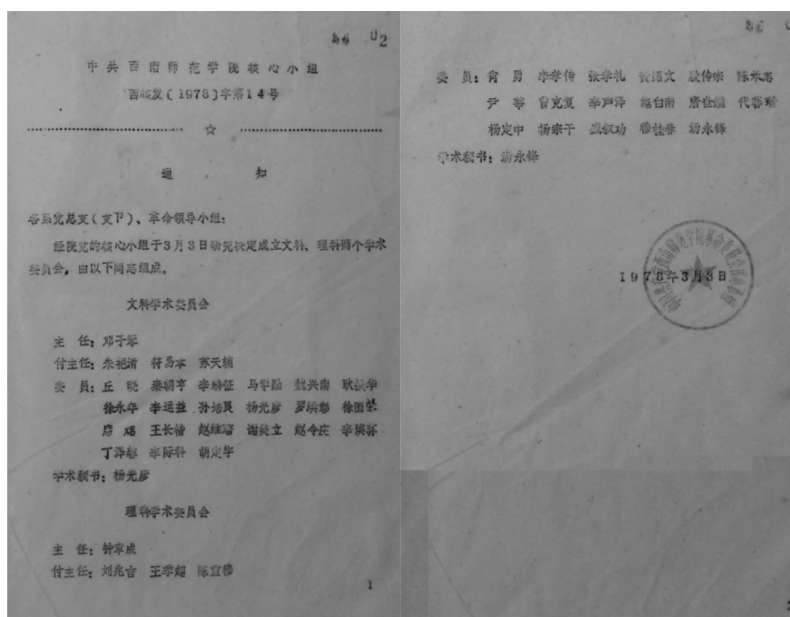
1.健全科研机构

为有效地开展科学研究,学校狠抓了科研机构的组建工作。1978年,成立了文、理科学术委员会。1980年,成立了西南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会。以后又陆续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心、研究所。到1990年,

^⑧ 报我院1990年函授、夜大学发展规模的函,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84-XZ11-80.0003。

^⑨ 关于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改为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的批复,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86-DQ11-6.0006。

^⑩ 西南师范学院关于开展文科科学研究的初步意见及科研项目安排,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78-行政-29。



学校成立文科、理科两个学术委员会(1978年)^①

学校设有教育科学、亚热带生物地理等 12 个研究所和高新科技、应用化学 2 个研究中心。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员达 509 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具备学术影响力、结构较为合理的科学研究队伍。同时，学校加强了重点学科建设，确定教学论、心理学等学科为重点研究方向。经过长期努力，学校在教学论、心理学、工艺美术等学科和领域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形成了一些特色和优势。

2. 开展学术交流

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开阔师生的眼界，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第一，开展学术活动。学校和各系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学术活动，举行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科普讲座、新学科系列讲座等。积极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组织教学、科研人员参加国内各级各类学术会议。第二，办好学术刊物。到 1990 年底，编辑出版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数学教学通讯》等 10 余种学术刊物。这些学术刊物为广大教师发表科

研成果、了解科研动态、交流教学经验提供了平台。第三，建立科技咨询机构。1985 年，学校成立了科技咨询公司作为学校教学、科研联系经济建设的桥梁，促进了教学、科研和经济建设的结合。第四，成立出版社。1985 年学校成立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又成立了西南师范大学音像教材出版社。出版社的成立满足了教学、科研、电教事业和对外信息交流的需要。

3. 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活动

学校积极鼓励和提倡学生结合课堂学习和社团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研活动。从 1979 年开始，学校先后建立了 30 多个学生社团。这些学生社团根据学科特点和

和任课教师的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考察，结合所学专业开展智力服务，举办各种学术报告会、表演会、论文竞赛活动，有的还参加教师的科学研究活动。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主要科研成果

1978 年至 1990 年，学校共有计划项目 1003 项，已取得成果 190 余项，鉴定(评审)111 项，有 87 项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24 项达到本地区先进水平，有 25 项科技成果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应用。出版专著和教材 110 部，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716 篇。在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学校先后与 40 多个县、市的 100 多个生产单位建立了科技协作关系，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 6 个，签订科研合同和科技成果转让合同 84 项。理科科学研究在基础数学、生态学、地貌学、区域地理、心理学等方面成就较为显著，形成了研究特色。如：钟章成教授^②在植物生态学方面率先在国内开展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定位研究，并与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建立和发展合作培养研究生和科研协作关系；学校与有关单位协作，

(下转 65 页)

^① 关于成立文科、理科两个学术委员会的通知，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78-党群-9。

^② 钟章成(1929—)，男，浙江绍兴人。曾任生物系主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长期从事生态学和植物种群生态学的研究。独编或主编《植物生态学研究进展》、《常绿阔叶生态学研究》等专著，发表论文 100 多篇。《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第 227 页。

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

□口述/王有超^① 整理编辑/郭 兰

编者按：西南农学院建校初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学校教学科研受到很大的阻扰。尽管如此，那个年代的师生们仍然坚守学校一贯的办学理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踏实的作风。

我是1957年9月通过高考被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录取的，农学专业总共招了四个班，我被分在一班。进校时，家里很穷，那个时候交通很不发达，从南充坐车，天一亮就开车，大约下午四点才到重庆北碚。我记得我们报到的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当时的大礼堂才修好，第一次使用，也作为学生食堂。在大礼堂吃饭是8个人一桌，伙食相当好，9块钱一个月的伙食，天天都在吃肉。每天早上有盐蛋或皮蛋、包子、馒头、花生米、稀饭，那个时候粮食还没有定量。作为新生，我们当时很老实，而那些老生则只吃包子馅，不吃包子皮。最精彩的是进校那一年的中秋节，食堂加餐，每一桌包括汤在内有十几个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全鸡，就是将一整只鸡蒸熟，我们大多都是从夹皮沟（很穷、很偏僻的山沟）走出来的，看到全鸡，也不知道该怎么吃，都没有吃全鸡，最后让老生把这道菜端走了。真正安心学习的日子没过多久，我们就经历了大跃进，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办科研、下放

农村、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一、大跃进形势下“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办科研”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学生参与“大炼钢铁”：采集矿石^②

^① 王有超，男，1957年考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西南农业大学校务处处长、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荣获西南农业大学优秀教师、农业部成人高等教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408-033。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校史校情

的总路线。总路线出来后,为使国家尽快发展起来,提出15年赶超英国,钢材要达到1070万吨,到处都是标语。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工业、科研都要大跃进,学生基本上都停课了,集体炼钢。我参加了学校大操场的炼钢,捡的是鸡窝矿,也捡些废铁,有时也到北碚石庙子(现朝阳桥)挑煤,再到学校大操场的鸡窝炉里炼钢,炼出了一些。我老家南充也炼钢,农民没有原料,就把家里的锅、瓢都拿去炼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每家每户煮饭吃,都是吃公共食堂。

除了大炼钢铁,这一时期农业战线上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产量指标和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等。我们学校提出红薯亩产二十万斤,水稻亩产十万斤。当年的西农“十万斤”,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我是运输队大队长,待学校一部分师生把秧苗选好后,七月中旬我们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用板车把秧苗运到现在西南大学六号门旁的水田里,由另一批学生把秧苗全部移栽在一亩田里。由于秧苗距离太近,田里温度很高,于是学校先用鼓风机对着秧苗吹,然后用电扇扇,最后竟给学生发扇子,给水稻扇风,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给水稻扇扇子。最终秧苗还是全部腐烂,颗粒无收。科研方面提出一年养十二次蚕,冬瓜要长到100斤左右,学校文工团还表演了类似的节目。

此外,学校还提出要大办农场。学校把农场的土地分给学生种,以10天为一旬,劳动6天,上课3天,修整1天,其实大跃进的时候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分了扁担和锄头,扁担一般是男生一人一把,每个年级还专门配有工具房。我们把大粪从奶牛场担到斑竹村的化粪池,之后再担到地里施肥。我们班种的是山东大花生,农场只派了一个工人来指导,从种到收都靠我们自己做,花生到收获季节时,没地方晒,就拿到男女生宿舍的地板上摊开晒。那时学生的品德相当好,即使是在寝室里晒花生,也没有任何人吃一颗,当时都知道吃了这个花生属于违反纪律,都不吃。

除了工业、农业大跃进以外,1958年3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在辽宁省召开了大专院校校长和党委书记座谈会,提出了“教育大跃进”。康生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检查工作时说:“以产量和学生毕业数来决定教授资格,农业大学的一级教授要5000斤/亩,二级教授4000斤/亩,三级教授3000斤/亩,四级教授2000斤/亩,五级教授1000斤/亩”。

二、全院师生下放劳动

1958年3月,农业部召开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校长会议,要求各个学校贯彻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三勤三放”,三勤指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我曾经参加了勤工俭学,还被评为积极分子。三放指下放农村、下放班级、学校向工农开门。西南农学院为贯彻中央政策,从1958年3月开始正式执行此政策,但实际上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变成了以生产劳动为中心,教学科研相对削弱了。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要求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同时农业部也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经验交流现场会,要求从1958年下半年起,高等农业院校的师生一律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1958年12月,我们学校把全校师生混



大办农场之学生种实习田^③

^③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2-SX12-3。

合编队下放到6个大队^④劳动。6个大队除了一个大队在学校,其余都分到四川的各个专区,包括内江、达县、南充等地,我被分到南充大队。

1958年冬,我们班被分到南充市南部县南隆人民公社劳动,住在南隆乡的农民家里,全是土墙房子,自己上山捡柴,烧火煮饭吃,一天只吃两顿,几乎天天劳动。我们在这里受考验的第一关是劳动关,我是农村出生,劳动不是问题,但城里面的学生就很困难。第二关是生活关,当时粮食已经开始紧张,下放之前,我们是敞开肚皮吃饭,但是下放后,每天只吃两顿,南部县是“红薯王国”,天天都要吃红薯,奇怪的是米饭虽吃的少,但班上的同学几乎都长胖了,可能是红薯吃的多的缘故。当时的劳动强度很大,除了在地里劳动,还要种试验田。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⑤有个优点是到处种试验田,其实都是下面的干部和学生种,但他经常来视察。我们种的是南部县县委书记的试验田,从种到收都是我们自己干。试验田种的都相当好,因为我们有老师和地方农业局干部的指导,基本上都是高产。



1958年师生向党申请下放农村参加锻炼^⑥



师生与农民一起种试验田^⑦

记得当时最艰苦的是没有柴烧,要到山上捡柴,捡了之后再靠人背回来。有一天我们班上4个女生,包括我现在的爱人在内,上山捡柴,走迷了路,天黑都没有回来,我们几个男生打着火把到山上找,找了两三个小时才找到,回到住地大概都晚上十一、二点了。那个时候的食物如肉、糖等都是定量供应,好在县委书记对我们很好,县委只要杀猪就让我们全班去“打牙祭”^⑧。我们一直劳动到1959年的夏天,可能当时中央觉得师生全部下放劳动对于培养接班人不利,于是就调整了政策,把下放的师生全部收回来,贯彻之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下放期间,我们也要上现场课,不完全只是体力劳动。植保系的老师华时珍被指派跟随我们班下乡,她给我们讲植物保护课,将农民土墙房子的门作为黑板,有些老师还在地里给我们讲课,记忆非常深刻。侯光炯也到我们下放的南部县给农民讲课,讲的是土壤普查,我们这些下放师生都参与了土壤普查,这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很有作用。为了配合土壤普查,我被分配到南部县晒金乡,住在乡政府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解放初期修的房子,条件相当艰

^④ 6个大队,即江津、重庆大队,宜宾大队,内江大队,达县大队,南充大队,留校大队。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8-行政-46,“西南农学院师生干部下放规划”。

^⑤ 李井泉(1905—1989),江西省临川人。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⑥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4。

^⑦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7。

^⑧ 打牙祭,原指每逢月初、月中吃一顿有荤菜的饭,后来泛指偶尔吃一顿丰盛的饭。



师生参加土壤普查^⑨

苦,让我与那些农业局的干部一起做土壤普查。侯光炯是大专家,但是他讲课农民都听不懂,加上他又是江苏人,好多老师还成了他的翻译。

下放对整个高等教育肯定有一定的冲击,因为以生产劳动为中心,劳动多了,教学科研相对少了,但是下放对师生也有几大好处:首先,1957年反右斗争后,干部以及师生脱离群众、脱离生产、脱离实践,下放使我们和群众相结合,将理论运用到生产中,从种到收、栽秧、打谷、锄草、施肥全过程全部都学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不光有理论知识,动手实践能力特别强。例如我们的师兄唐尚格^⑩,插秧插的笔直,农民都夸奖他。通过下放很好地解决了师生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问题。

其次,下放中我们与农民相处的很好,当时我们住在南隆人民公社,村里面红白喜事都请我们去吃饭,也不送礼,有时我们生病了农民也来看我们。1959年返校时,农民还哭着舍不得我们走。最精彩的是我们走的那天,农民把鸡蛋、花生都塞给我们,有点像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送新四军的感觉,我们也感动地流泪,都不想离开那里。但是当时

学校做出决定,5个大队全部师生从驻地返回学校,并派车来接,我们只有服从。

最后,师生下放,也把科学技术带到了农村,让师生知道如何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下放期间我们办了一些短期夜校,例如要种棉花、水稻的时候,指导农民怎样种。老师给我们上现场课,也让农民来听课,渐渐增长了他们的知识。

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最先由刘少奇副主席在1958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他指出:中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全日制的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全日制的工厂、机关工作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称为“七·三〇指示”,指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花国家一分钱,农业大学到农村,其他的大学到工厂,实行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即共大既办大学也办中小学。”1964年农业部和高教部联合做出决定,将北京农业大学、沈阳农学院、南京农学院、华中农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南农学院作为试行半农半读的高等学校。同年10月,农业部召开这六所农业院校校长会议研究改制问



返校时,农民赠送给师生的物品^⑪

^⑨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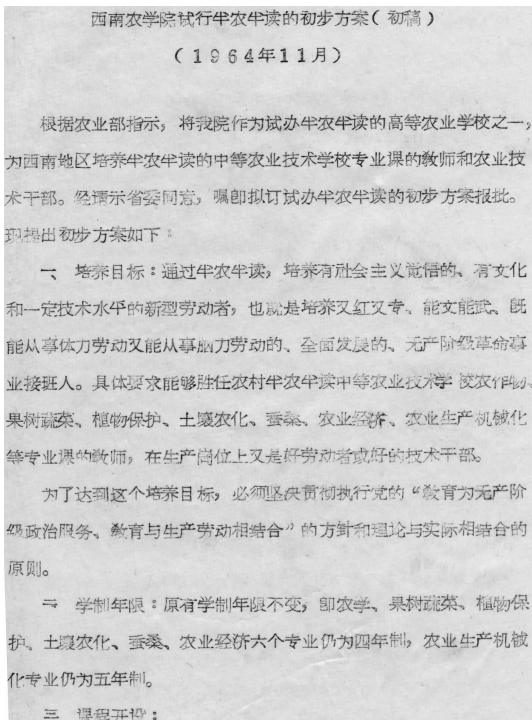
^⑩ 唐尚格,男,1959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西南农业大学农学系副主任、主任,作物栽培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研究生处处长等职。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如重庆市食品工业生物工程发展规划研究、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等。参见《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

^⑪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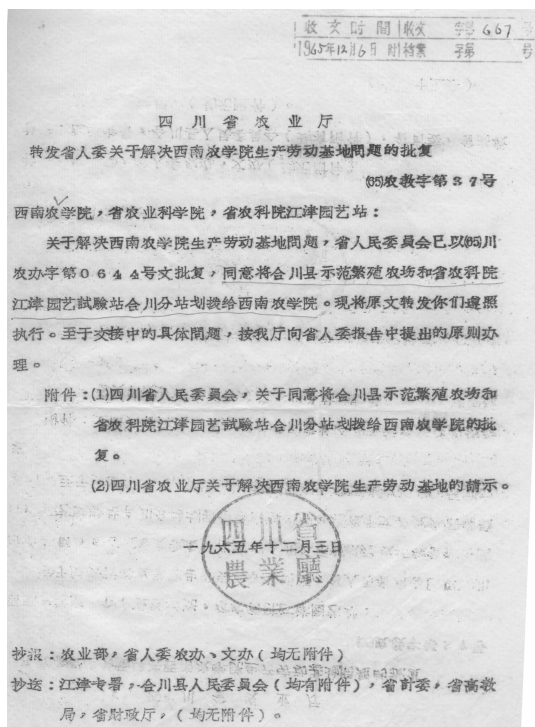
题,我们学校由李兰^⑫书记参加。李书记在会上提出我们学校先在农学系一年级搞试点,然后再扩大。

1964年11月,我校动员试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当时对半农半读很疑惑,认为自己挣钱来办学校,到底大学还办不办。后来朝阳农学院提出,朝阳有多大,学校就有多大,感觉大学成了大家来学,但这是中央的政策,谁也抵挡不住。1964年底学校制定了半农半读教学计划,提出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劳动者,能担任半农半读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专业课教师和新型农业技术干部。本来我们学校原先的想法是在学校先搞试点,但后来因为抵不住中央政策,于是在全院实行了半农半读,一部分在学校,一部分在校外实行。

1965年春,学校有几个系的一年级学生就开始到国营江北农场试行半农半读。这些学生待的时间



西南农学院试行半农半读的初步方案^⑬



四川省农业厅转发省人委关于解决西南农学院生产劳动基地问题的批复^⑭

不长,宿舍都是现修,劳动时间相当长,上课少,以10天为一旬,6天劳动,3天上课,1天休息。在江北农场做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农场以经营畜牧和果树为主,这与我校培养的专业不对口,不能很好地配合学院试行半农半读工作。于是学校向四川省农业厅反映,要求换地方。1965年12月,四川省政府作出决定,把四川省管理的合川农场共2000多亩地全部划拨给学校。学院在江北农场试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8个月(1965年3月至1965年10月)之后,由于合川农场已交给学校,于是撤出江北农场,在合川农场继续试行半农半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

我当时是在学校试行半农半读,学校把土地分到班上,每周劳动时间比校外的半农半读要少一些,那时教职工也种田。我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时我们

^⑫ 李兰,女,1938年7月在山西参加抗日工作,此后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晋绥分区党校、中共晋绥八地委、中共吕梁区委、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等处工作,1954年底调入西南师范学院任办公室主任一职,1956年调入西南农学院,历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书记。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LX0705-001。

^⑬ “西南农学院试行半农半读的初步方案”,我院关于试行半农半读有关资料,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4-行政-41。

^⑭ “四川省农业厅转发省人委关于解决西南农学院生产劳动基地问题的批复”,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5-行政-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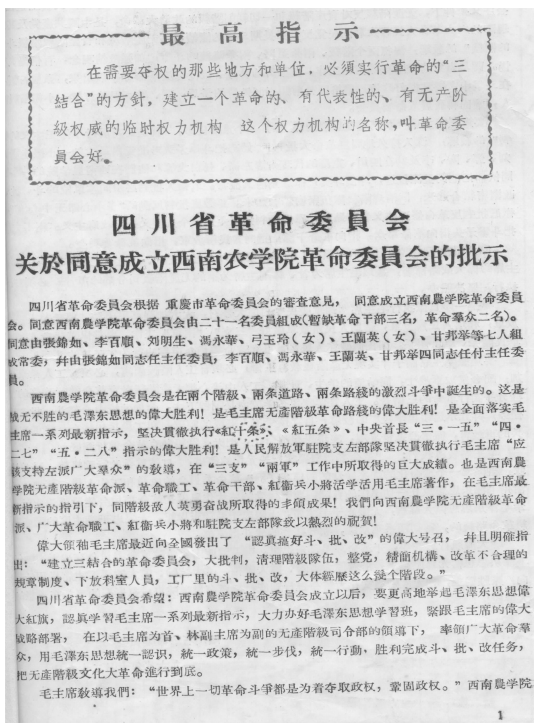
校史校情

种的是棉花实验田,每周劳动两三个半天。文革开始后,校外的半农半读撤回来了,校内的半农半读也停止了,一天到晚写大字报,揭发走资派。

四、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共青团花园也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我是和学生同食同住同劳动,也遭到了大字报。文革中开始是大字报,后来就出现夺权,学校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两个派系打嘴仗。北碚发生“武斗”期间,师生员工纷纷离校,返校后仍然害怕。

1968年,“军宣队”进驻学校,1969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军宣队、工宣队从造反派手中夺权之后,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西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批示¹⁵

一切权利掌握在他们手中, 普通工人和普通士兵就把学校接管了。夺权后他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能进入革委会的都是表现好、出身好的, 没有进入革委会的行政干部和走资派就被编成机关联队。修襄渝铁路的时候, 学校师生编成六个还是八个联队修铁路, 我本来也要参加, 学校找我谈话, 结果让我夫人参加修铁路, 而我则留在学校。我在机关联队负责安排生产, 因为我是农村出生, 又是农学系毕业, 尽管后来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 但是对于农业的那一套还是相当清楚。所有的水田、果园都由我们管, 种的是胡豆、豌豆, 收获后就把胡豆杆埋入田里施肥, 亩产还达到千斤。机关联队一直到军宣队撤走后才撤。

五、“社来社去”¹⁶

文化大革命后期, 学校恢复招生, 1975年开始招“社来社去”班和工农兵学员。除了校本部以外, 学校还在万县和南充办“社来社去”班, 万县由尹晓楼¹⁷负责, 南充是何仁普¹⁸负责, 本来我也要南充去上课, 但后来换成我们教研室另一个老师去了。“社来社去”班基本是保送不考试, 学习一年之后哪里来回哪里去, 那个时候保送的学生总的说来表现还是比较好, 没有什么歪风邪气。办学主要是为基层培养干部, 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原籍工作, 也没有被当作干部对待, 只发了一个学籍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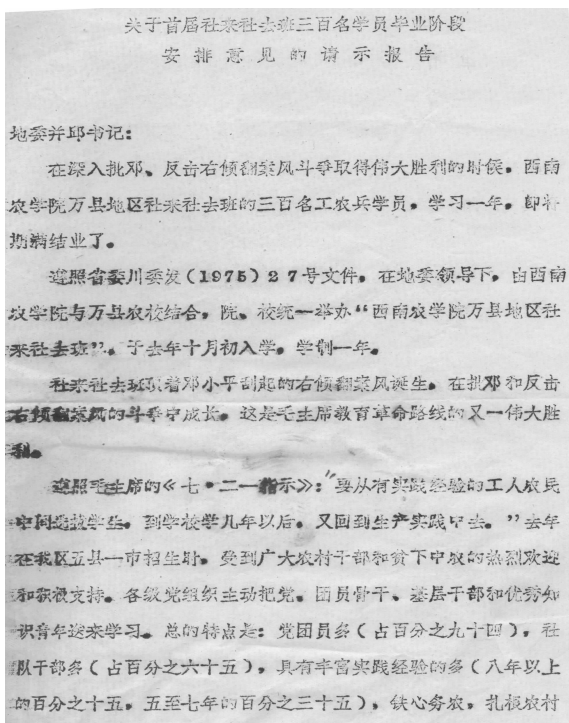
1980年四川省农业厅又决定从当中招录一批优秀学员, 考试相当严格。我是政治课的命题老师, 把我们这些命题老师“关”在成都青羊宫的小招待所出题, 管理相当严, 上厕所都必须三个人一起去。后来我们有意见, 于是又在大冬天把我们“关”在峨眉山, 相当冷, 管理还是很严。“社来社去”班通过考试录取的学生后来有不少发展成基层干部, 也有不少当了领导, 如农业局局长、副局长等。1976年之后就

¹⁵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西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02-1968-党群-5。

¹⁶ “社来社去”, 指中专毕业生从公社选派来, 毕业后再回到原公社工作。1963年3月我国教育部下达《关于改进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意见》, 其中提出, 农、林、医、师范学校除招初中毕业生外, 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从公社招收经过生产劳动锻炼的初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 毕业后由原公社安排, 为公社培养人才。据此, 各地在农、林、医、师范等类学校中进行了“社来社去”的试点。

¹⁷ 尹晓楼(1914—2007), 男, 山西静乐人。193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 1963年10月至1984年4月任西南农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1984年离休, 2007年7月逝世。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03-SW0404-004。

¹⁸ 何仁普, 男, 195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 后分配至西南农学院工作, 先后任党办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等职, 1994年退休。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03-TX0703-002。



西南农学院万县地区“社来社去”班关于首届三百名学员毕业阶段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⑩

没有再办“社来社去”班了，南充农校和万县农校也随之撤了。

回顾在学校工作生活的这 53 年，我觉得学校有两大突出特点：

一是重视实践，业精于勤。粉碎“四人帮”之前学校把“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以生产劳动为中心。当时学校提出的大办农场、大办工厂、大办科研其实都是号召在实践中学习，理论为实践服务。之后刘鸿仁^⑪担任校长时提出“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推广也是为地方服务。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也很强。我在当学生和老师的时候就学会

了几门手艺，首先是学会了剪头发，我是西南农学院的高级理发师，当学生的时候为同学们剪头发，在搞社教时，由于农民没钱剪头发，于是我就买了一把剪子，挨家挨户为农民剪头发，当处长、校长的时候，刘鸿仁和张郁^⑫的头发都是我剪的。记得有次在外实习，我给老师、学生剪头发，当地的医生、百货公司的售货员都说西南农学院来了个高级理发师。其次我还学会了木匠活，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去做家具，学会了做椅子，那时学校还时兴做加拿大的折叠椅子。此外我还学会做煤油炉，当时燃料很紧张，要到天生桥担煤球，后来为了方便就烧煤油，但是我当时的工资只有 53 块钱，买不起煤油炉，于是我把装汽油的铁桶用来做煤油炉，先用钢锯锯，再手工敲，煤油炉做了十多个，也用了很多年。

二是西南农学院的师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毛泽东在文革前和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是要节约每一个铜板，周总理在接见外宾时，掉在饭桌上的饭菜都要捡起来吃。我们当学生的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学校的侯光炯教授的勤俭、朴素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粉碎“四人帮”后，侯光炯的穿着还是相当朴素，根本不像个教授的穿着，吃的也很简单。我们学校的师生也是通过劳动锻炼出来的，穿着艰苦朴素，生活勤俭节约。我当学生的时候，每个月 2 元钱，看电影 5 分，买个柚子几分，其他就是买肥皂和理发，后来我学会了理发，根本不在外面剪头发。过生日的时候就买点花生，饼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过。通过劳动，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的精神，以至于我们走在大街上，老百姓一眼都能认出我们是西南农学院的学生。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⑩ “西南农学院万县地区‘社来社去’班关于首届三百名学员毕业阶段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76-党群-32。

^⑪ 刘鸿任，男，1954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西南农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校长等职，主持的“培养扎根农村科技人才的新模式”项目，获 1993 年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此外，在科教兴农、外事工作等方面还受到农业部、省、市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 10 余次。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参见《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

^⑫ 张郁，男，1959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西南农学院团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曾荣获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四川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参见《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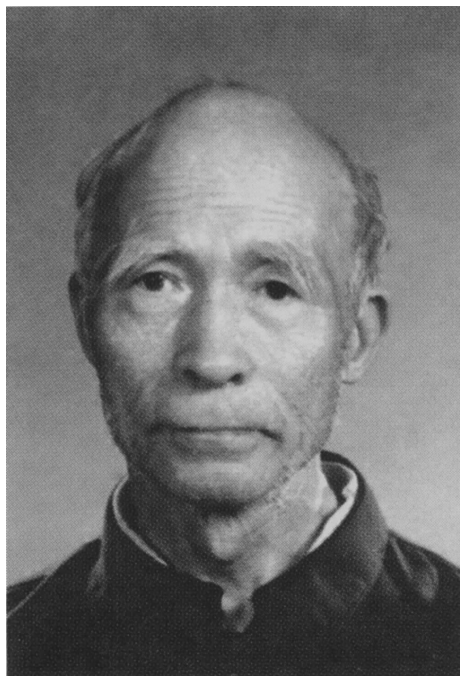
编者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作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之一的《红楼梦》，从问世至今，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名师大家品评、研究之，吴宓教授即是近现代研究《红楼梦》的义理派红学代表人物。本文以沉浸于《红楼梦》的吴宓开篇，用大量的史料诠释一代红学大师。



“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大地处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位于西南一隅的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校园也不例外，一样是刀光剑影，一样是杀气腾腾，铺天盖地的是血淋淋的大字报、大标语，震耳欲聋的是高音喇叭传出的“打倒”、“炮轰”、“油炸”、“勒令”，不时有一队队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从教学楼、职工宿舍楼前走过。

然而在校园里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在一间狭窄、阴暗的小屋里，坐着一位戴着眼镜、瘦骨伶仃、白发苍苍的老人。此时此刻的他，孤独无望、处境悲凉，但却手捧一部《红楼梦》，边读边流泪，他仿佛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也忘记了外面喧嚣的世界。他已完全沉浸在《红楼梦》的“太虚幻境”之中。

这位老人是谁呢？他就是一生酷爱《红楼梦》、被友人叹为“一代文章矜四海，平生骚怨寄红楼”^①的一



老年吴宓（1973年摄于北碚）

^① 转引自韩进廉《知音灼见——评吴宓先生的贾宝玉论》，载李继凯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

代国学和红学大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

一、用“世界眼光”审视《红楼梦》第一人

说起当今的红学家，今天的读者已很难想到吴宓。这也难怪。因为吴宓关于《红楼梦》的著述，全部发表在解放前的报刊杂志上，而这些报刊杂志如今已难寻觅。据查有以下几种：

(1)1920年发表《〈红楼梦〉新谈》，载上海《民心周报》第1卷第17期(1920年3月27日、第18期(1920年4月3日))。

(2)1942年发表《〈石头记〉评赞》，载桂林《旅行杂志》第16卷第11期(1942年11月版)。

(3)1945年发表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载成都《流星》创刊号(1945年1月1日)。

(4)1945年发表《贾宝玉之性格》，载成都《流星》第1卷第2期(1945年2月10日)。

(5)1945年发表《论紫鹃》，载《成都周刊》第1期(1945年3月11日)。

(6)1945年发表《〈红楼梦〉之教训》，载《成都周刊》第3期(1945年3月25日)。

(7)1945年发表《〈红楼梦〉之人物典型》，载《成都周刊》第4期(1945年4月1日)。

(8)1945年发表《王熙凤之性格》，载成都《流星》第1卷第3、4期合刊(1945年4月)。

另外，他还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大学作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如1919年3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红楼梦〉新谈》的演讲；抗战期间，又曾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遵义浙江大学、成都燕京大学、乐山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作过《红楼梦》专题演讲。有的演讲，反响很大，如1944年9月在遵义浙江大学作《〈红楼梦〉人物分析》专题演讲，曾轰动山城遵义，被当地报纸誉为“山城盛事”。

虽然吴宓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并不算多，但意义却十分重大。如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即后来发表在上海《民心周报》上的《〈红楼梦〉新谈》，学术界认为这是“国人首次将《红楼梦》介绍到海外，



吴宓 1919 年在美国波士顿

其红学观既不同于索隐派、自叙派，也不同于胡适的考据派，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精神，借助西方思想来重新解读曹雪芹的这部心血之作”^②。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整个中国红学界正以胡适派考据学为主调，而吴宓却高屋建瓴，用比较文学的手法，对《红楼梦》的伦理道德、思想境界、人生哲学、艺术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和理论探索。著名学者冯至1990年曾说：

常听人说，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科学’，或者说是‘陌生的名词’。殊不知吴宓在70年前就撰写过《〈红楼梦〉新谈》，用西方小说、悲剧与《红楼梦》相比较，探讨《红楼梦》的价值。……我认为，如今谈比较文学，不仅要追溯到吴宓，而且有必要研究一下吴宓当年怎样对中西文学进行过平行比较。这样，比较文学在中国就不是“陌生的名词”了^③。

可以说，吴宓是用东西方结合的理论，用世界的

^② 王泉根：《论吴宓与20世纪中国文化》，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③ 冯至：《略说吴宓》，载李继凯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眼光来审视《红楼梦》，并把《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化之林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一人，这是吴宓对红学最大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把吴宓称之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④，更有甚者，把吴宓誉之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⑤，看来也不无道理。

如果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发表）是引用西方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部著作；那么，吴宓则是运用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和比较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吴宓“不愧是促使红学走上世界的早期‘推波助澜’者”^⑥。谁能不说吴宓是红学大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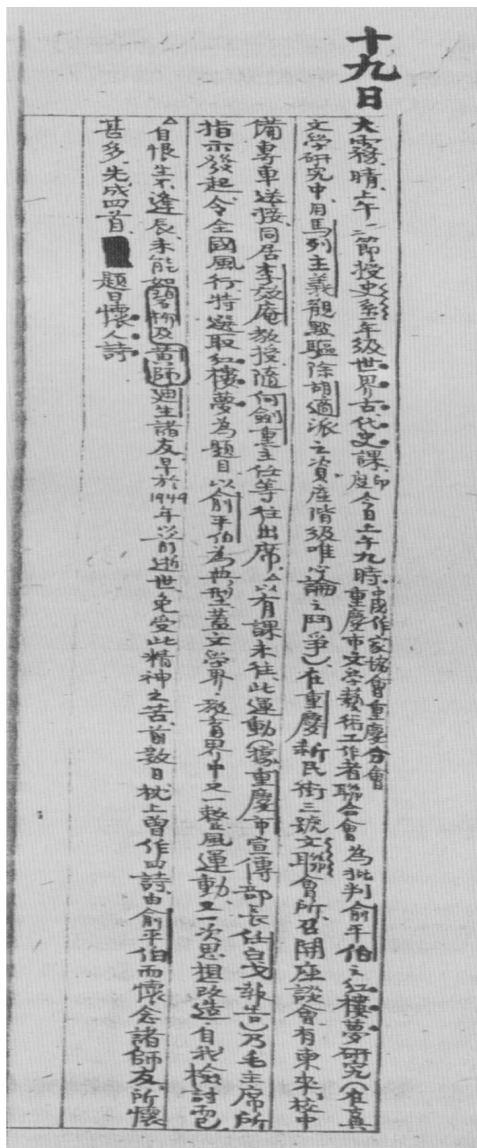
二、“绝口不谈《红楼梦》”

按道理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了，环境改善了，有关《红楼梦》的资料更丰富了，研究条件更好了，吴宓本应该在红学上大显身手。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红学大师从此再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也没有作过一场关于红学的学术报告，甚至当人们“问他关于红学的问题，他一直闭口不谈”^⑦。

这是为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解放后一次又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4年那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使他对继续研究《红楼梦》彻底绝望。如今这场批判运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被人淡忘了，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研究红学的人则是刻骨铭心的。我们从1973年，即“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为出版《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而写的一段《编辑说明》，仍可明了这场批判运动在当时是何等触目惊心：

1954年10月，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运动。这是全国解放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斗争。这

场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刘少奇、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同时也打破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长期统治，从而，在《红楼梦》研究中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资产阶级“新红学”便开始破产。^⑧



此为吴宓1954年11月19日日记手迹。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表明了他对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态度

^④ 杨周翰：《吴宓——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载李继凯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⑤ 赵连元：《吴宓——中国比较文学之父》，载李继凯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⑥ 段启明：《吴宓与红学》，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⑦ 刘又辛：《吴宓先生的贡献》，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⑧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编辑说明》（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吴宓由于在解放前发表过多篇《红楼梦》文章，作过多次《红楼梦》学术讲座，又曾和俞平伯、胡适有过交往，自然“罪责难逃”。我们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曲折的心路历程。

1954年11月19日，吴宓出席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联召开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他心情沉重，回来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此运动(据重庆市宣传部长任白戈报告)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迪生诸友(即黄节、吴芳吉等吴宓师友——笔者)，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⑨。

你看，吴宓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眼光，认定这场由毛泽东发起的批判运动不仅仅是针对红学界，而且是针对文学界、教育界广大知识分子，是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运动，只不过是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开刀罢了。对他和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这不啻又是一场精神折磨，因此他“自恨生不逢辰”，生不如死。

实际上，就在几天前，当他得知即将要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时，他夜不能寐，深为老友担忧。为此，他特为俞平伯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雪苑声名水绘居，吟诗度曲意尤舒。

无端考证红楼梦，举国矛锋尽向渠。

(2.P67)

在举国上下揭批声讨俞平伯之时，吴宓竟然赋诗对俞平伯深表同情，吴宓之举，有胆有识，实属难得。

也就在这一天(1954年11月19日)，他在日记里道出了他自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的庆幸与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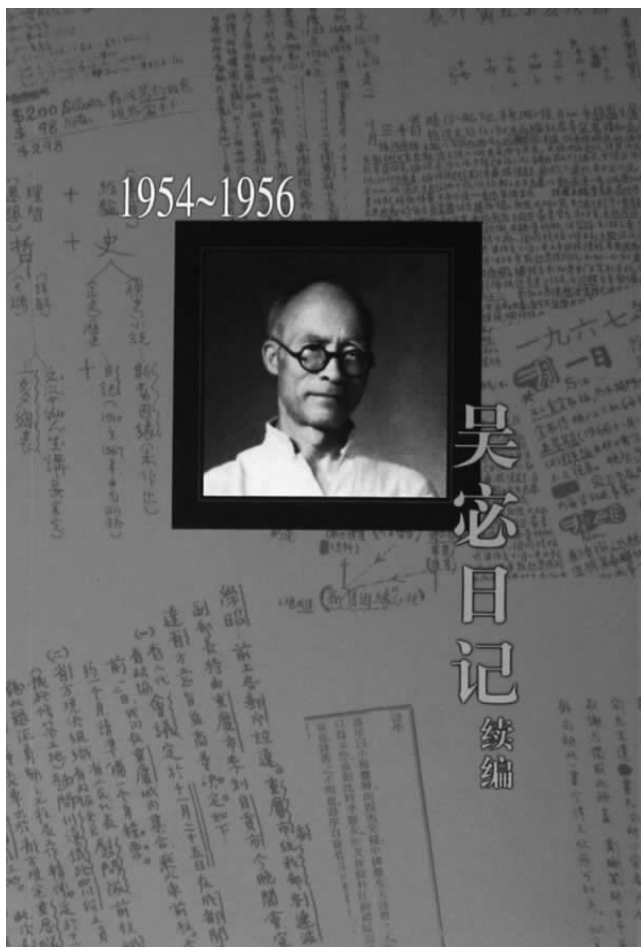
此次批判检讨，宓自不得不参加。幸宓自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此次尚未遭曳出受审，未尝非韬晦之益。宓缘此复甚忧惧。

(2.P67)

吴宓毕竟是个书生，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既然有“自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的“韬晦”之举，这次批判运动大约可免遭“曳出受审”。但他又十分不安和“忧惧”，毕竟他在解放前写过不少《红楼梦》研究文章，事实俱在，只要稍加追查，即可“曳出”。果然，没过几天，随着形势的迅速变化，他已无庆幸感，而只有“忧惧”了。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连日读报，各地批判《红楼梦》研究之运动甚嚣尘上，宓在势无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涂，以此心极不乐。(2.P69)

吴宓终于明白了他在这场批判运动已“势无可逃”了。耐人寻味的是，他用带有贬意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

^⑨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5页。说明：以下凡引《吴宓日记》文字，只在该引文后注明册数和页码。此段引文应注为“(2.P65)”。

的成语“甚嚣尘上”来形容这场批判运动,流露出他对这场批判运动的蔑视和厌恶心情。然而,要他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巧为词说,自责自涤”,无疑又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

第二天(11月25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与几位同事聊天,同事劝慰他,“谓宓之《红楼梦》解说,实较俞平伯为‘进步’”,并认为“宓与胡适无关系”,“昔且尝为敌对”(2.P70),所以此次批判运动不会受到累及,让他放宽心。但吴宓听了一点也不感轻松,仍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12月1日,他在给友人写的诗中表露了他的担忧:“身存尚有名为累,引罪陈辞事未央”,并特别说明此诗是“有感于《红楼梦》批判”(2.P74)。

果然,12月12日,即吴宓庆幸自己“尚未遭曳出受审”才20多天,他就被迫当众作了第一次检查:

上午9:00至12:30,又下午2:30至6:00在教室大楼1201室,赴中系所召集之讨论《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问题座谈会(来函特约宓)。系主任何剑熏主席。宓以第四人发言,分三段(一)我对此会及本运动之认识。引昨报载郭沫若之言。(二)我自己之思想检讨。(三)我旧日对《红楼梦》之评论。(2.P80)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吴宓在这一天发言的内容,但从中文系一位领导听了他的发言后,“讥宓仍存有封建主义唯心论之观点”中可知,他的发言让领导极不满意。

然而,吴宓的检讨却引起了校领导的重视,认为可以把他作为此次批判运动的典型。在他作检讨的第3天,学校一领导见到他,“命撰《红楼梦》检讨文登报”(2.P82)。也就是说,既要吴宓作深刻检讨,还要把检讨拿去登报,公之于众。这对吴宓来说,不啻是一场更难堪的精神折磨。一个多月过去了,他的检讨仍未写好。正在此时,四川省政协又要召开了,吴宓是省政协委员,省领导又指定要他在政协会上作检讨。会前,1月14日,校领导又找他谈话。他在日记中写道:

约10时,谢院长招往,命(已指定)宓撰写发言稿,须谈二运动(指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笔者)之体会,并以稿呈阅,定。宓大苦。(2.P100)

虽然吴宓深感写这种违心的检讨是“大苦”之事,但毕竟要完成任务才行。二天后,即1955年1月16日,吴宓将检讨呈送谢院长,不料谢院长看后很不满意,要他重写。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约11:00谒谢院长,呈初稿,大不谓然,命改撰;须自行批判胡适、《红楼梦》二运动中之宓。宓归,大伤悲,自视如囚之陪受死刑。回舍,午饭前后勉撰次稿成,凡四段(二运动)。……知谢公来邀,乃赴办公楼再到谢宅。谢公细阅二三过,提改数处,宓悉遵从之。(2.P101~102)

对于吴宓来说,要他写检讨已不算新鲜事,自解放后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就多次被迫写检讨,甚至也曾将他的检讨作为典型被弄到《新华日报》发表。但那毕竟是检讨自己的思想,如今却是要他既检讨自己的思想,又要揭批友人,说违心之言,这确实是“大伤悲”之事。正如吴宓所形容那样,“如囚之陪受死刑”。

然而令吴宓没有料到的是,这次的检讨稿已经那位校领导再三指点和启发,又经该领导亲自“细阅二三过,提改数处”,这下总该满意了吧。谁知当1月15日吴宓到省政协报到并呈上自己的检讨后,竟仍然不获满意。1月17日,省委统战部领导找他谈话。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晚饭后,乐怡然导统战部杨同志来,还宓稿,多所指责,命另作,专谈《红楼梦》,不许提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宓苦甚,但即在灯下作出大纲,又全文(一)(二)段。(2.P107)

你瞧,吴宓有多为难!那位校领导要他在检讨中不但批俞平伯,还要批胡适,而省统战部领导又强调他在检讨中“不许提及胡适”,并要他在交代过去研究《红楼梦》的往事时“不许自高自大”,这种相互矛盾的要求,让他无所适从,确实让吴宓“苦甚”。

第二天凌晨4点,吴宓就匆忙起床,“就桌灯撰稿批判‘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天亮后即呈交领导。还好,这一次写的检讨总算获得领导认可。当天晚上,“统战部杨同志以宓稿(《红楼梦》)还宓,云:‘对此无意见’,又释云:‘此稿可用,汝即照此讲可也’”(2.P107)。

1月22日,吴宓在省政协大会上作了检讨发

言,发言稿自然就是这篇按领导意见两易其稿,再三修改的检讨稿。吴宓在日记中虽然没有记下这篇发言稿的内容,但记下了只讲了10分钟,看来这份检讨稿并不长。有意思的是,仅隔了几天,吴宓将这份检讨稿抄寄一份给友人时,特别申明这个检讨稿只是他“虚与敷衍周旋而已”(2.P118)。一语道破了天机,泄露了他的检讨完全不是出于真心,而只是“虚与敷衍周旋而已”,多么鲜明地表明了他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真实态度。2月25日,他在日记中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解放后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痛苦心情:

盖自解放后五年来,宓备经忧愤困辱,对世运与时局,早已极端失望,知千年流布涵濡之文化道德,业已斩断渐灭,……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运动,如狂飙怒潮,驱迫我等再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其苦人最甚。(2.P131)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他对老友俞平伯更加同情和担忧。3月30日,当他在报上读到俞平伯被迫作的长篇检讨文后,“不胜同情悲苦”。他在日记中写道:

坐读俞平伯今春所作《自我检讨》长文,不胜同情悲苦。亦如黄有敏(系吴宓之友)君所吟“自讼万言流涕读”也。(2.P141)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吴宓自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也不再研究《红楼梦》真实原因了。

三、心灵的寄托 积郁的宣泄

尽管一生痴迷《红楼梦》的吴宓自此不再把《红

楼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也不想《红楼梦》研究上有所作为,但不等于说他已与《红楼梦》彻底告别。恰恰相反,他在精神上更依恋《红楼梦》了。据我粗略统计,仅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3年底的8年时间里,吴宓在日记中提及《红楼梦》竟有120多次。原来他已把《红楼梦》作为他精神生活的寄托,作为他化解苦闷,宣泄积郁的一剂灵丹妙药,真正到了“平生骚怨寄红楼”的地步了。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则表现得尤为突出。

1965年11月,由姚文元一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而吹响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到了1966年,政治形势已越来越紧张,不少人已有大难临头之感了。1966年元旦,有同事贺君到吴宓家“倾谈”,对政治形势忧心忡忡。吴宓竟以《红楼梦》为例来劝慰这位同事。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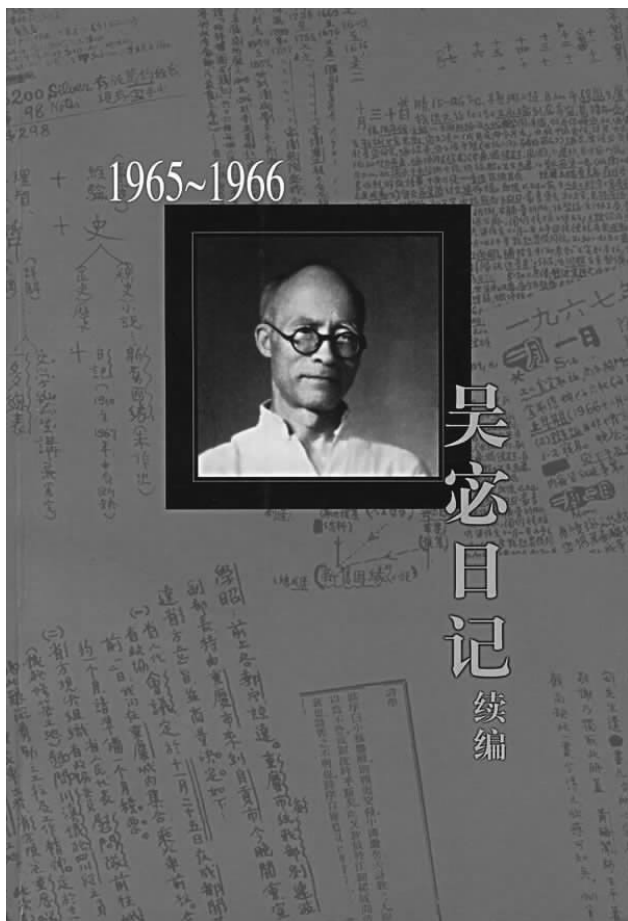
宓以《石头记》及史事为例,述宓之人生观,劝贺君通识、达观,以舒其冤愤,并以李康《运命论》授之读。(7.P327~328)

虽然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并没有记下他以《红楼梦》为例,阐述自己人生观的内容,但我们却可以从窥探出《红楼

梦》对于吴宓的人生观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然而过了十几天,吴宓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他“以《石头记》及史事为例”诠释自己人生观的答案:

自1964年至1965社教运动以来,更知宓出身地主阶级,受资产阶级教育,其关系之重大,而思想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

改造在宓尤为急要，应勉力去作。……按宓年过七十，老人最注意、首应解决者，为生与死之矛盾。……对于生死问题，宓今不思不计，听其自然。宓在1958年已曾宣布“对于现今之宓，我即刻死，明天死，二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死，心情上都是一样的，早死不悲，迟死不喜，临死亦不惧”云云。然在世一日，仍必勤学勤读，努力工作，一若我尚可在世许多年者。(7.P339~340)

这种“通识、达观”的心境，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依据。1966年1月15日，即他写上述文字的第二天，他又读起《红楼梦》来，并在日记中写道：

晚，久读《石头记》抄家前后若干回，与解放土改等比较，伤心落泪不止。(7.P343)

然而让吴宓没有料到的是，几个月后，他就亲身体尝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他的小屋被“扫四旧”的红卫兵抄了个底朝天。让他最痛心的，是他几十年写的日记，精心保存的全套《学衡》杂志及几十部《吴宓诗集》，以及不少珍贵藏书、海内外学界名人通信、珍贵照片等等，均被抄走。

整个“文革”期间，吴宓的精神处在极度苦闷、不解、悲愤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更离不开《红楼梦》了。如1966年4月，吴宓虽然当时还没有被“揪”出来，但心里明白这只是迟早之事。只有以读《红楼梦》来解脱自己的郁闷和忧惧。4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2:00至中文系，2:30至5:30中文系教学改革学习会，…宓在会中，心甚愤懑。回舍，读《石头记》三十七八回，乃略舒。(7.P406)

你看，吴宓只有读《红楼梦》，“愤懑”之心才“略舒”。可知读《红楼梦》对他舒缓精神压力有多么重要。

随着“文革”的发展，校园里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7月6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校园里“有学生民兵到处布岗，昼夜监视每舍每家人之出入往来”，“众不敢互访，亦不敢交言”(7.P481)。不久之后，吴宓果然难逃“文革”布下的“天罗地网”。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已近70高龄的他，

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大会批斗，甚至在批斗大会上被摔断了腿，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在这倍受煎熬的日子里，他唯有读《红楼梦》才能让他得到精神抚慰。1967年4月3日，即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近一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读《石头记》43~44回，流泪，觉甚舒适(宓此情形，少至老不异)。(8.P917)

原来吴宓从15岁开始读《红楼梦》以后，始终是把读《红楼梦》作为舒缓他精神压力的处方，只不过到了“文革”期间，这种依赖性更强烈罢了。

四、背诵《红楼梦》以自遣

“文革”是一场灾难，一场恶梦，而对于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吴宓来说，苦难的日子更难熬过。吴宓除了读《红楼梦》以使心情“略舒”外，在无法读《红楼梦》的时候，则以背诵《红楼梦》的诗词、回目来自遣。

吴宓对《红楼梦》，可以说已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其中不少精采片段、全部诗词和回目，他都能倒背如流。即使到了“文革”后期，经过“文革”的残酷批斗和精神折磨，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记忆力急速下降，甚至连同一教研室的人他一时都记不起姓名的情况下，却依然能背诵《红楼梦》。他所在教研室一位青年教师起初还不相信，但后来几经当场对证，证实吴宓“《红楼梦》的回目却全背得，一定不错，我们试过，千真万确”。^⑩

吴宓在政治学习会上，在劳动“改造”时，在批斗他的场合下，他都能以默默背诵《红楼梦》来打磨时光、消极对抗。如1966年8月17日，他所在中文系集体学习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晚上还要大家写批判稿，而吴宓此时在干什么呢？请看他在这天的日记中透露出的秘密：

晚8—10(点)上班，宓自默《石头记》回目(失其六)，未撰批判稿。(7.P523)

你瞧，吴宓竟敢抗命不写批判稿，而以默诵《红楼梦》回目消极对抗。可能是当时心绪太乱，他一时未能完整背诵出《红楼梦》回目。但过了两天，中文系又集中学习有关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

^⑩ 徐洪水：《吴宓在西师中文系》，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见百万师生的文件。而吴宓此时根本未听文件传达，又悄悄默诵起《红楼梦》的回目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 3:30~4:30 上班。命学习八月十九日《重庆日报》(详记十八晨北京毛主席会见百万革命师生之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4:30~6:30 枯坐,休息。默(《红楼梦》)回目,全无误。(7.P526)

此时此刻,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革命师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最高潮,而吴宓却“枯坐”一旁,专心默背《红楼梦》回目,而且上一次没有背全,他耿耿于怀,这一次终于全部背出,达到了“全无误”。不久,吴宓又被驱赶到由学校“牛鬼蛇神”组成的劳改队里劳动。无论是除草、种菜、看守粪池(怕附近农民来偷粪,故派人看守——笔者)时,他都趁机背诵《红楼梦》回目以打发时光。如 1967 年 4 月 2 日的日记中就写道：

下午 1:30~6:00 菜圃(坐肥料室)宓专职看守粪池,自阅昨《新重庆报》,读《杜诗镜铨》,背诵《石头记》回目。(8.P89)

12 月 5 日又在日记中写道：

10:30 出,在劳改队外遇唐季华,多所规慰。……乃至大礼堂独坐,背诵《石头记》回目完。乃赴食堂,立候正午午餐。(9.P366)

可以说,吴宓能在任何场合静下心来默背《红楼梦》,这已成了他调节自己思想情绪的重要方式,成

了他忘却世间烦恼,熬过苦难岁月的一种解脱方式。

五、结论

吴宓之所以天天不间断地写了一辈子日记(幸喜绝大多数被保存下来,并于 2006 年由三联书店全部出齐),其原因正如他在 1951 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友人劝他将全部日记烧掉以避祸时,他不听劝而说出了其中的原委：

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述,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1.P111)

可见吴宓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就是把它作为宣泄情感,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同样,吴宓几十年如一日地阅读、背诵《红楼梦》,也是把它当作宣泄内心郁苦的方式,两者异曲同工,目的一致。吴宓对《红楼梦》的依恋太深了,无论外部压力有多大,都难以压抑他深沉的《红楼梦》情结。

然而不能不说,一个对《红楼梦》有过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的红学大师,却不能继续进行红学研究,而只能把读、背《红楼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宣泄方式,这不仅仅是吴宓和红学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责任编辑 姚恒)

编者按:2007年10月30日晚,在西南大学第三届金秋文化艺术节交响音乐会现场,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连续演唱了《穿军装的川妹子》、《亲亲茉莉花》和《我的依恋在这里》三首歌曲,她就是1986年毕业于西南大学音乐系的著名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李丹阳。

亮丽在璀璨的星空

——记青年歌唱家李丹阳

□文/刘之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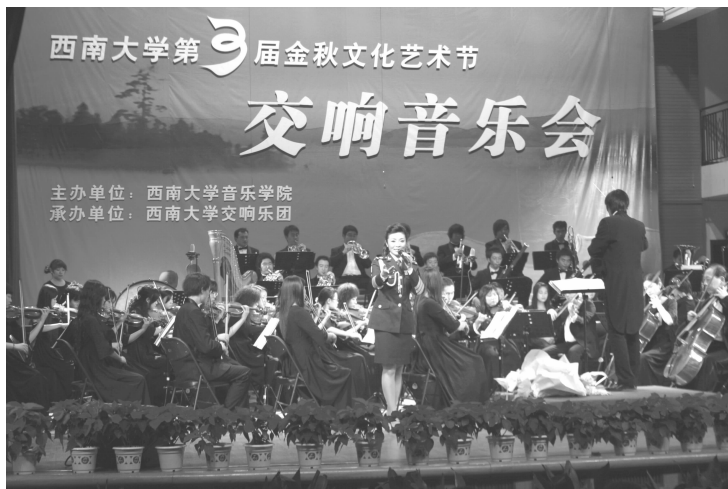
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李丹阳,在艺术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走过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奋斗之路,追求之路……

初展才情,一曲《穿军装的川妹子》,李丹阳以她那朴实无华的形象,俏丽秀美的嗓音,一举荣获全国首届MTV大赛金奖。李丹阳和她的歌,从此为更多的中国老百姓熟悉和喜爱;

紧接着,继1994年以一曲《遥远的拜年》获全国MTV大奖银奖后,1996年她演唱的《亲亲茉莉花》再获此项赛事金奖;

在1997年—1998年度的全国MTV大赛评选中,她演唱的《军歌声》,从600多首参赛作品中又一次脱颖而出,蟾宫折桂,第三次捧得金奖!

与此同时,她还于1992年、1994年、1996年连续三届被评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评选的



舞台上的李丹阳^①

“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其得票排名均在前三名之列!

几年中,三获专业性比赛金奖,又三获普通听众热情而神圣的“认可”而成为“最喜爱的歌手”之一,李丹阳无疑在灿若群星的军中歌手中成为一颗抢眼的亮星。

这只美丽的丹凤,是如何飞进声乐殿堂,翱翔于艺术之巅的?

《穿军装的川妹子》果然是地道的川妹子。故乡的山水情,父母的养育恩,是她艺术生涯的源泉和起点。

李丹阳是四川成都人,地道的川妹子,而且还是家里三姐妹中排行最小的幺妹子。打小,丹阳和她的二姐就天生一副好嗓子,说起话来清脆贼亮,疯闹起来,那银铃般的笑声能飘出半里地。说来奇怪,丹阳的父母却没有那么好的嗓子,俩人说话都有点哑声

^①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2007-SX12-16.



军歌声声演唱会上李丹阳与战友亲密合影

哑气。直到后来长大了,调皮而聪明的丹阳终于“考证”出了奥秘:原来是“隔代遗传”的缘故——因为她外婆的嗓音好听!

如果说,丹阳从外婆那边继承了一副不错的嗓音,那她的父亲则是开发她艺术天赋的启蒙老师了。她父亲早年在部队曾搞过文艺工作,拉得一手好二胡,转业到炼油厂工会工作,自然少不了成天跟琴棋书画、文艺体育打交道,耳濡目染,小丹阳自小也对文艺、体育感兴趣。一把老旧的二胡,成为联系慈父与爱女之间情感的纽带,每当悠长婉转的胡琴响起,三姐妹便竞相引吭高歌。那时刻便成为全家人的精神会餐、狂欢节日!童年的丹阳,从古老的二胡和稚嫩的歌声中,初识了音乐的美妙。

平实的家庭自有平实的精神追求。为了培养女儿们,父母亲节衣缩食,毅然买回一架当时还是相当奢侈的扬琴;女儿们想学舞剑,痴心的父亲下班回来,居然找来木片自制,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削,削得太忘情,一不小心竟把手指头的皮也削去一块……

热心的邻居见小丹阳歌唱的好听,纷纷向她父母提建议,出主意,其中不乏“馊主意”:如要她每天早上坚持吃一个生鸡蛋,说这是滋养嗓子的“偏方”;还有的建议小丹阳早起要找有瀑布的地方练声,保管有效等等。对此,丹阳的母亲深信不疑,果断的督促着带领着丹阳——“实践”……实践的结果,丹阳见了生鸡蛋就皱眉咧嘴,难以下咽。但是小瀑布那儿喊嗓子特过瘾,流水潺潺,清纯的歌喉仿佛与之合二为一,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找到某种神韵……

那时,丹阳父亲所在的工厂因污染较重而搬迁到成都郊区,那地方叫天迴镇。也就是老作家李劫人

先生的著名小说《死水微澜》所描写过的地方。绿油油的竹丛,清脆的山野,古老的青石板路,晶莹剔透的溪流河沟,当然也还有那个“小瀑布”。丹阳就是在这里与农家的孩子一道上学放学,一道嬉戏玩耍,一道唱歌跳舞。淳朴的民风民俗、浑然天成的大自然的造化,如歌如诗,如情如梦,早已深深积淀于丹阳的心灵深处。如是,她的歌才那么真诚甘美,情意浓厚,毫无半点雕琢造作之感!

让我们再次聆听她的歌。无论是《穿军装的川妹子》、《亲亲茉莉花》,还是《红月亮》、《遥远的拜年》,几乎每一首都映照出她生活经历的影像,勾起她童年生活的记忆。她是用心歌唱。无怪乎她每唱红一首歌,便有一个新的“雅号”不胫而走,在歌迷中传扬开去——“川妹子”、“红月亮小姐”、“茉莉花姐姐”……

从基础到大厦是一个系统工作,幼苗成才既是必然,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她倍感欣慰的是,在学习声乐的道路上,她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爱唱歌和会唱歌,实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让李丹阳开始明白原来唱歌还有那么多的学问的人,应该算是她的中学音乐老师。

就是这位夏老师,从一群蹦蹦跳跳嘴里哼唱着无名小调的高一女生中发现了丹阳,他敏锐的感到她的先天条件很好,是块唱歌的料。于是,他找到了丹阳的班主任,并托班主任问丹阳:想不想学唱歌?想,太想了!丹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以后,每逢周末,丹阳就去夏老师那儿学习唱歌,从视唱、练声、认谱开始,夏老师为丹阳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他尽自己的能力,扶携引导着丹阳,开始触摸到那巍峨艺术殿堂门前的基石,进而迈步开始登上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级台阶……用丹阳的话说,夏老师是她艺术道路上的发现者和引导者,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外表柔弱的丹阳,也有其倔强如铁的一面。既然声乐艺术殿堂展现出无穷美妙的魅力,就得认准目标不懈地追求,丹阳自此告别了凭兴趣好玩儿似的天真,开始了有意识的执着求索。只要听说哪有好老师,她便托母亲、托熟人引荐,或者自己干脆上门登堂入室请教。1982年高中毕业前夕,丹阳面临紧张的复习准备高考,可她听说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

在上课，就毫不犹豫地一口气交了10堂课的学费。每周，她骑自行车赶去旁听，完了又骑着车赶回学校住宿，依旧投入书山题海的复习中……丹阳的班主任有意见了，跟她父母下了“最后通牒”：丹阳的成绩很有希望考个好大学，可到这种节骨眼上她还迷恋什么唱歌，那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在这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丹阳又一次碰到了好运气——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慧眼识人，将她提前录取了！

对西南师大，丹阳至今深藏感激之情。因为那时的丹阳就其专业来说并不出众，充其量只是块也许有点特长的“毛坯”。所谓的“慧眼识人，难就难在这里：既要有敏锐的眼力，善于发现可能有希望成才的苗子；又要有勇气和魄力，敢于承担某种责任。倘人人都知道此人已是各方面都很成熟的人才了，“拿”来就能用，又何谈什么“慧眼”呢？果然，进入西南师大的丹阳，突然一下就找不到感觉了！钢琴，她一窍不通；视唱练耳，老是不能达标；还有什么乐理呀和声啦，弄得她晕头转向，她成了班上的“差生”！最惨的，竟然一时没老师愿意教她。最后，系里不得不采取“优劣搭配”的方法，将她“搭配”给了一个年轻老师施教。

那一刻，丹阳差不多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甚至想到了退学。步向艺术殿堂的道路竟是这样艰难，其专业知识的博大精深也大大超出了丹阳的想象，她似乎才真正的明白了，这世上要想真干成一件你认准了的事，得付出全身心的努力，甚至需要孜孜以求地奋斗，才可能有所成就的啊！

丹阳从来不是个自甘认输的人。初入大学的彷徨和迷惘，反倒激起了她强烈的上进心。

好在，那位青年教师很能理解丹阳的心情，在悉心的为她“开小灶”的同时，给了她很大的自由的空间。她充分利用起自己所有休息时间，啃着厚厚的书本，整天不是泡在琴房里练琴练声，就是扎进电化教室里，捧起一大堆诸如郭兰英^②、鞠秀芬、彭丽媛^③等这些名家的音带，默默地拜她们为师，细心地揣摩……春去秋来，没等大二结束，丹阳的专业水准已一跃而成为全班仅有的6名“主修生”之一。这意味着，她将升格为由“教授”级的老师来带她们了。

教师姓刘，一个已过6旬的老太太，又是一个大好人。如果说那位青年老师待丹阳像大哥，这位刘教授则是对丹阳倾注了母爱般的关怀。她对丹阳的成长功不可没，几乎倾其所有，把自己毕生资料、研究成果全都传给了她。数年后丹阳已成“名人”，每每提及西南师大的生活，仍会激动得难以自己。

当然，在丹阳的成长大路上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声乐教

授金铁林。1988年丹阳首次亮相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一曲《成都小吃人人爱》使许多观众认识了这个嗓音不俗的川妹子。那时的她已是重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一时间，唱片公司、电视台纷纷找上了门。正是丹阳大展宏图的最佳时机，她却出人意料的再次选择了当学生，只身北上到中国音乐学院深造，拜到了金教授门下。在中国音乐学院这座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丹阳仍是靠她那勤奋而又执着的追求，不显山不露水地默然苦读，逐步引起了金教授的注意。在金教授的精心指导下，丹阳的歌唱艺术产生了新的飞跃，并逐步开始形成了自己清纯而刚劲、甜美而火辣的演唱风格。



生活中的李丹阳

^② 郭兰英，我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走红的歌舞剧演员和歌唱家，她因演出歌剧《白毛女》而一举成名，后不断在演唱界刷新纪录，她演唱的《南泥湾》、《绣金匾》等上百曲老歌在全国传唱，荣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百度百科

^③ 彭丽媛，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文职将军，也是深受军内外观众喜爱的著名军旅歌唱家。——新华网

艺术才能的多样化来自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只有在艺术实践上敢想敢闯,敢于向自己挑战,才会有出息。天赋+机遇+勤奋,是她成功的要诀……

从1988年开始到1996年,李丹阳年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让人们惊奇的是她参演的歌曲除了好听、有味儿,其风格也是大异其趣。

那时1990年的春节晚会,李丹阳别开生面地唱了一曲川味儿极浓的《闹新春》。那是一首节奏鲜明、朗朗上口、极其热烈奔放的歌。更绝的是李丹阳在这首歌里采用了一种类似西洋花腔的快速顿腔的手法,与曲调所采用的四川清音《哈哈腔》的旋律相配合,以一口“川妹子”特有的嘴皮子利索劲儿,一口气连珠炮似地甩出十几个“啊哈哈”,使这首歌的表现力张扬到极致,把现在气氛调动得热闹非凡。以致后面接着演唱的韦唯^④差一点就找不到北了。事后韦唯向李丹阳打趣说:“嗨,你这‘闹新春’,闹得我一闭眼满脑子都是你那‘啊哈哈’的旋律,我都不知道唱什么调……”细心的观众也从中发现,李丹阳原来不光会唱舒缓咏叹式的一种腔,偶尔也能来点“闹”味十足的“劲”歌!

艺术才能的多样化来自多方面的艺术实践。而艺术实践,从来又是风险与机遇同在,成功与失败并存。但丹阳有这个狠劲儿,不怕失败,只要有机会,照样尝试不误。在西南师大大四时,全国举行“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她卯足了劲儿奔去参赛,结果铩羽而归。初次参赛虽以落榜告终,却让她得到了宝贵的锻炼,大大开阔了艺术视野。1986年她仍以学生身份参赛,且参加的是专业组,与歌坛“大姐大”彭丽媛、董文华^⑤等同组比赛,居然也捧回个“荧屏奖”。这似乎增添了她的信心,敢于实践的勇气更加锐不可挡。于是,继1989年的“海峡同乐杯”全国歌手大赛第三名后,1990年丹阳以正

式专业演员的身份再次闯入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终让她获得了三等奖!可别小看这个三等奖,这实实在在地意味着丹阳的歌唱艺术终于得到了各界权威的认可,确立了她在



着军装的李丹阳在舞台上

在中国民族声乐歌坛的地位!事实也是,那一届的“三等奖”中,确实荟萃了一批后来蜚声歌坛的歌手,除李丹阳外,还有宋祖英^⑥、刘玉婉^⑦、吕继宏^⑧……

许是从小崇拜父亲曾是一名军人的缘故,丹阳对军人生涯特别向往。1991年春,她再次做出令人惊讶的选择——参军入伍,成为二炮文工团的独唱演员。二炮所属部队大多数分布在深山大漠,条件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贫乏。李丹阳的歌从此相伴着火箭兵战士们的军旅生涯,走向祖国的山山水水,走进战士们的心灵深处。在军营,李丹阳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火箭兵战士们甘守艰苦,无私奉献的壮丽情怀,也成为李丹阳从艺做人不断完善自己的强大精神动力。1993年丹阳接到参加首届MTV大赛的任务时,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军人的形象搬上音乐电视。结果,《穿军装的川妹子》一举夺魁,乐坏了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战友们,他们亲切地称李丹阳是“我们的川妹子”——这发自内心的爱,的确是战友们对她的最高褒奖。

李丹阳演唱拍摄了一批音乐电视。在艺术上永不满足的她把每次拍摄机会都当做是一次超越。拍

^④ 韦唯,流行歌手、作曲人和演员,其作品有《爱的奉献》、《亚洲雄风》等。

^⑤ 董文华,知名歌唱家,擅长演唱抒情歌曲,其代表作品有《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

^⑥ 宋祖英,中共党员,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其代表作品十分丰富,如《辣妹子》、《好日子》、《小背篓》、《龙船调》等。

^⑦ 刘玉婉,中国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如《北京人说话爱说个您》。

^⑧ 吕继宏,男高音歌唱家,海政文工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歌坛的实力派歌唱家之一。其代表作品如《红珊瑚》《赤道雨》。

《亲亲茉莉花》时,她与编导密切配合,精心设计,使这部音乐电视无论从音乐到画面,从人物造型到创意设计,甚至是字母的设计,都十分讲究,加上精细的后期制作,一时开创了一派唯美风格的先河。拍《静夜思》出于内容与形式上的需要,从没接触过京剧的丹阳硬是拜京剧演员为师,从眼神、手式、身段到化妆、穿衣一样样地学。到正式拍摄时,她满头满脸一丝不苟地“堆”着京剧青衣的“全副武装”,接着导演的要求不厌其烦反复排练,脸上从没“贴”过“片子”的丹阳难受得直想恶心呕吐,她咬牙坚持着,以致拍到后来几乎晕倒在地……还有曾经得金奖的《军歌声》,更是把丹阳从里到外累了个半死,片中的集体配角是四川武警部队著名的“霸王花”们,而作为主角的她却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柔弱女。没说的,丹阳照旧一个字——学!擒拿格斗,挥枪舞棒,一招一式地边学边练,片子拍完,丹阳的那几下还真满是那么回事呢!

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从艺和做人力求尽量完美,是她不变的心愿。

李丹阳成功了。近几年来,金灿灿的奖杯,红彤彤的证书,一个接一个,一本接一本地抱回了家;每逢重大演出,总能见到她飒爽的倩影,听到她动人的



李丹阳的军旅生活

歌声;个人专辑也出了一集又一集。她现在是二炮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1991年穿上军装以来,她还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面对荣耀的光环,面对鲜花和掌声编织的彩带,李丹阳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她还是她,还是那个“穿军装的川妹子”。她清醒地知道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就如同人生开始后中间是没有句号一样。从艺和做人,她都力求完美!于此,在她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她再一次选择了当学生——进入由文化部、教育部和中国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民族声乐研究班”。按照丹阳的话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跨世纪”的研究班——20世纪末进校,毕业时已经进入21世纪了!多有意义啊!

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李丹阳,正值歌唱艺术的成熟期。在艺术的道路上,她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走过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奋斗之路,追求之路!她还要继续走下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她心里明白,有多少人在关注她,期望着她,她不能让忠实的听众、观众失望,更不能让她成长付出了许多的亲人们、老师们失望……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高才逢良时,丹凤正朝阳,我们祝福她,振翅直冲万里云天。

后记:本文选自2000年出版的《缙云山下一支歌》,转眼间10年已匆匆而逝。从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优秀青年演员民族声乐研究生班毕业之后的李丹阳在新世纪更是取得硕果累累:2003年参加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2003《中国原创歌曲》颁奖中荣获特别演唱奖;2004年在第八届全军文艺会演中获特殊贡献奖;2005年《老支书》获全国廉政歌曲评选金奖;2006年获“中国学艺届十大孝子”提名奖;2007年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在大型舞蹈史诗《东风颂》中演唱《为你插上飞翔的翅膀》,获“文华表演奖”。

部分图片来源: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李丹阳/tupian/list/2010>)。

(责任编辑 杜玫娟)

编者按：在西南大学近现代建筑群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建筑，朴素而陈旧。虽坐落于南北校区之间的主干道旁，却很少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更不知它的历史渊源，这座建筑就是原西南农学院大礼堂。



西南农学院大礼堂

□整理编辑/牟乔雅 王贤



昔日的大礼堂(背面)^②

西南农学院大礼堂位于现在的第四运动场的西南角上，在光炯楼和楠园三舍之间。大礼堂于1956年破土动工，1957年落成，是一个单层砖木结构的坡屋顶建筑，其长68.4米，宽17.2米，高5.5米，中间跨度16.62米^①。整个礼堂可容纳1200人左右。

在大礼堂修建以前，学院师生主要的集会场所是操场或食堂。食堂最多可以容纳300人左右。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食堂已不能满足集会的需要。但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要求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规定不准修建楼堂馆所（办公楼、礼堂、宾馆、招待所）。于是学院响应号召，决定修建一个既用来就餐又用来集会的场所，因此，大礼堂的工程名称为饭厅兼礼堂。

^①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57-总1-059.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X12-7.

西大地标

修建大礼堂的地方当时是北碚农事试验场的桃花山,由于桃花山后面就是学生宿舍,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不能放炮开山,只能用人工开凿。学院用了200多农民工,单是平地基就耗时半年多,共挖土石方约6000 m³。

礼堂落成后,就成了集师生就餐、集会、跳舞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场所。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全盘苏化,样样学苏联,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生活方式,都向“老大哥”学习,如根据学生家庭的经济

收入,给学生每个月评定学习补助费,学生吃饭也是免费的,而且饭菜很丰富。刚开始同学们在里面吃饭时都是站着吃,没有凳子。礼堂的后面还有几间房子作厨房(现已拆除)。平时这里也是全院师生集会的场所。到了周末,这里变成了“舞厅”,据说,苏联大学生经常举行交谊舞会,我们的大学生不会跳交谊舞,显然跟不上形势,于是学院开展扫舞盲运动,要求师生都学跳交谊舞,校领导张一夫、何文俊等也是“舞厅”的常客。



60年代,西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李兰动员全院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③



60年代,师生在大礼堂举行文艺演出^③



1959年,西南农学院业余文工团乐队在大礼堂前合影^③

^③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X12-6.



学生在大礼堂外听报告^③

1958年学院把学生食堂搬到了石园村,大礼堂就主要成了学校大型集会、文艺演出、放电影等的场所,并将教室里不用的桌椅搬到了大礼堂。整个大礼堂边边角角都渗透着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红色氛围,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领导人画像悬挂在最醒目的位置,还有各类口号、标语。



1960年共青团西南农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礼堂举行^③

文革期间,大礼堂便成了召集全院职工开会和批斗“四类分子”、走资派、学术权威的舞台。只要他们的行为不端或言语出轨,就会被揪到台上狠狠批斗或检讨,同时也成了贴大字报的地方之一。

恢复高考后,随着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每当开会听报告时,大礼堂已容纳不下全院师生了,学院就在大礼堂的屋顶上安装一个大喇叭,部分学生就自带凳子在大礼堂外边或礼堂前面的路上听报告,这也成了学院的一道风景线。以后大礼堂更新了椅子,有40多排桌椅,每隔18公尺升一级做成阶梯形式。每



2000年11月1日袁隆平院士在大礼堂给全校师生作报告^③

年的金秋九月,大礼堂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西农人在这里聚集,在六月离别的日子里,又送走一届届的西农学子。著名校友袁隆平院士、吴明珠院士也多次回母校给师生作报告。每逢周末,大礼堂会集中放电影供师生观看。学院曾于1984年对大礼堂进行过加固,2005年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后,作为师生重要的集会场所和文艺舞台的大礼堂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曾经人声鼎沸的礼堂变得静寂无声了。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王远伦^④、林元吉^⑤的口述)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④ 王远伦,男,工程师。1947年考入原私立相辉学院文史系,毕业后留校参加西南农学院建校工作,此后在西南农学院工作长达35年之久。负责并参加了学校新建宿舍、人防工程、农场建设等工程,并于1956、1963、1986年组织制定了学校的总体规划方案。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408-042。

^⑤ 林元吉,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9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蚕桑系,留校任教。曾任蚕桑系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蚕桑丝绸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代理院长。见《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名录》第258页。



香樟林 的 记忆

□文/骆平^①

编者按：香樟是西南大学最多的乔木之一，聚而成片的“香樟林”也有若干处，“香樟林”是学生社团活动、私人约会的重要场所，“香樟林”中留下了大学生们太多太多有关青春、理想、友情的记忆。在青年作家骆平的笔下，西南大学的香樟林又是怎样一番景致呢？

偶然读到张抗抗的一篇散文，里面有一段对香樟树的描绘：那棵树有一种端庄的王者风度，两人合抱粗的树干呈深黑色，树枝如巨大的龙爪，遒劲而伸展，缀满了繁密的树叶，即使在深冬也依然葱郁。树底下落着紫黑色的小果子，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淡淡地袭来……

张抗抗说，北方没有香樟树，它立于江南，是杭州城市的标志，但是，她不知道，重庆也有。在西师的校园里，那是最寻常的一种树，成片地，将巨大的树影投在迤迳的石板路上。它们静美而肃穆，充满强烈的生长气息。

因为香樟树，我常常想念我的大学，那是极为真实、极为干净青春岁月，

是我生命里最清澈的一条河流。我虽然依旧年轻，可是学校里那种纯粹、简单的感觉已不复存在。我在慢



西南大学田家炳书院前的樟树林

^① 骆平，女，199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宣传统战部副部长，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

慢变得喧嚣和斑驳的生活里,学会了含蓄地微笑,学会了掩饰自己的忧伤和徘徊,示人以幸福的神采。

那一年到重庆的时候,夏天刚刚过去,在家乡,正是有微凉的风以及落叶无尽的季候。

下了火车,在菜园坝,阳光竟然如此炽热,眼里的街道很脏,很杂乱,刹那间我有些晕眩。学校还远,坐在车里,渐渐就离开了城市,路两边都是稻田,闪着金色的光芒。

进了西师的校门,人还是恍惚的,迎面长长地石阶和建筑都是旧旧的,窗上爬着纷乱的藤蔓,像一些纠结的记忆。然后,我看见香樟树了,挺拔,修直,枝冠茁壮,树叶是深绿的,可能夜里下过雨,看上去润湿洁净,一种浓郁的植物和青苔的味道让我完全怔住了。那样轩昂的树,那样暗暗的清凉的树影,仿佛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个无法企及的幻觉。

由此而改变了最初的犹疑,由衷地快乐起来,与那些同样喜欢肆意说笑的女孩子一起四处逛荡。中文系的教室已经有些年代了,每一块青绿的砖都有着沧桑的烙印,香樟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身进窗内,像一张静止的素描。文学课的话题总是会蔓延到千年以前,在花树芬芳的水边,许许多多的诗就这样被吟咏,被传唱。侧身而入的香樟树于是有了《诗经》般苍翠的美。

在1994年,西师的树木花朵特别多,并且一点都没有刻意规划的痕迹,树可以乱乱地长,花也没有太多什么章法,长青藤从春天开始就在房檐上努力地爬啊爬啊,也没有人一剪刀狠狠地剪下去,它们的

美都是原生态的,古典而沉默,一如中国画的清淡。

后来,在美术系后面,我发现了成林的橘树,开着小小的、玲珑的白色花,香气馥郁。

走出橘林,是一块韵味如小桥流水的地方,几株香樟树空寂古朴地伫立其间,我和宿舍的七个女孩在那里拍了几张相片。如今给朋友看,她们永远以为那是江南的景致。

大三在校报做编辑,编辑部在香樟林的旁边,一处缓坡上,屋子“曲径通幽”地掩映在林木中,柔润的雾霭整日微微流淌。傍晚,我喜欢在窗前看隐隐约约的缙云山,而在天晴的夜里,可以看到山间小屋的灯光,宛如星子一样绚烂。在那里,我编了两年的副刊,大学生的文章总是充盈着海市蜃楼的婉约,倒是有一个男孩子怀念母亲做的腌菜的短文令我感动至今。

从香樟林旁的校报,我到了成都的一家报社。报社外也有树在绿,也有花在开,然而我不断想起西师的香樟树,大片大片的影子铺天盖地、温暖地停留在我的心里,似乎时间的脚步在这里放得特别特别的缓慢。

其实当年的功课与香樟无关,当年的悲喜与香樟无关,当年惨痛的爱情也与香樟无关,我却更加想念它。

(本文选自《缙云山下一支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 韦雪贞)



西南师范学院与

《蝶恋花》

□ 整理编辑 张小兰



编者按：轰轰烈烈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人、特殊的事，舞剧《蝶恋花》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 1957 年 5 月 11 日为纪念杨开慧、柳直荀，复信柳直荀夫人李淑一而写。“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西南师范学院文工团的同学们被诗词的深情所震撼，在全国高校第一个将它改编成舞剧搬上舞台。

1958 年夏，毛主席诗词《蝶恋花》发表不久，西南师范学院文工团的几个年青人被毛主席诗词中洋溢的革命激情，充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鲜明的爱憎立场，博大的胸怀、细腻的感情，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所吸引，同学们决定将其改编成舞剧。与此同时孙泐书记也极力鼓励学校文工团在全国高校第一个将毛主席的《蝶恋花》搬上舞台。



1958 年排练舞剧《蝶恋花》^②

^① 该照片由林富珊提供。林富珊，女，1956 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科，1960 年毕业留校任教，1962 年调重庆市群众艺术馆，1984 年任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1987 年起连续 4 届任重庆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是舞剧《蝶恋花》的主要成员。
^②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60-SX122-01。

1958年排练舞剧《蝶恋花》^②1958年孙泐书记看望舞剧《蝶恋花》编创人员^②

于是院文工团成立了《蝶恋花》编创组，一周之内就拿出了剧本及舞蹈设计初稿，经过不断的修改、排练，不到一个月一个小型舞剧于1958年冬走向了舞台。

最初的剧本只有二幕：第一幕：风雨中，杨开慧、柳直荀身负重刑，在反动派的押解下向周围的乡亲壮别，二人相互鼓励，敌人罪恶的子弹杀害了他们；第二幕：月宫，一派喜悦，嫦娥、吴刚带领众仙女，迎接来自人间的贵宾，“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而两位忠魂仍然依恋着人间。当革命胜利的消息飞上天际，两位忠魂万分激动翩翩起舞，与仙人共贺革命的胜利。

杨开慧、柳直荀在天上俯揽人间胜利^①

初演后,剧组根据领导、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对《蝶恋花》又进行反复修改,将原来的二幕扩充为五幕:序幕——在烈士塑像前;工农觉醒——打土豪分田地;狱中牺牲——杨开慧、柳直荀殉难;长征;月宫迎英雄——嫦娥献舞、吴刚捧酒。



起义(工农觉醒——打土豪分田地)^①

中共重庆市委和院党委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文工团向市委汇报演出后,市委组织了有关单位座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市委宣传部部长王若同志还亲自来西南师范学院,认真地审查了舞蹈,并和业余文工团的同志们举行了座谈,对这个舞剧的创作和演出作了重要的指示。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也对舞剧的创作、排练直到演出都给予了及大的重视和关怀。加之同学们的努力终于创作出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的舞剧《蝶恋花》。编排上也由原来的五幕扩展到十幕:序:低回婉转的音乐声中,两尊白玉石般的塑像前,老将军给孩子们讲起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烈士塑像前^②

第一幕：“秋收暴动”；第二幕：“撤退（杨开慧被捕）”；第三幕：“夜袭（柳直荀牺牲）”；第四幕：“狱中（杨开慧视死如归）”；第五幕：“忠魂飞天”；第六幕：“进军”；第七幕：“迎宾”；第八幕：“泪飞”；尾声：“国庆”。

修改后的“蝶恋花”，突出了人民革命斗争的画卷，两位革命志士塑造更为丰满，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更具浪漫情调，有较好的组舞、双人舞、独舞，艺术性增加了。



杨开慧在狱中（与狱中的难友们怀念狱外的战友怎样与敌人斗争）^①



第七幕（胜利后老百姓迎接红军）^①



第八幕“泪飞”(嫦娥、吴刚在天上迎接杨开慧、柳直荀二位忠魂)^①

随后,舞剧在1958年5月的重庆高校文艺调演、1959年共青团中央全会与国务院工作会议上的演出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受到胡耀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祝贺,称赞西南师范学院创造性地表演毛主席诗词,头带得好,值得专业文艺工作者学习。



西南师范学院文工团舞蹈队同志合影^①

参考文献:

- [1] 西南师范学院校报:1958年9月21日第175期第2版。
- [2] 西南师范学院校报:1959年1月24日第195期第3版。
- [3] 西南师范学院校报:1960年8月12日第265期第1版。
- [4] 《漫游中国大学丛书—西南大学》第58-60页。

(责任编辑 李亚勃)

缙云山自然景色秀美,奇峰挺立,林木葱郁,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在五十年代,曾有虎豹等大型食肉动物出没,有一天,一只豹子下山了……

校园豹影

□口述/王远伦 整理编辑/牟乔雅 王贤

20世纪50年代初,缙云山上常有豹子出没,有一次,山上的豹子受到惊吓竟然窜到西南农学院校园里来了。

那是1953年夏,缙云山上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中共西南局领导建楼修路,开山放炮声震耳欲聋,受到惊吓的豹子从山上跑到了山下。与此同时,上千名建校工人正在西南农学院北碚天生桥新校址建校,工人在校园里搭工棚食宿。那时候工人的伙食相当不错,三天一个小牙祭,一星期一个大牙祭,食堂的肉味很远都能闻到。受到惊吓的豹子也许是被食堂的肉香味吸引,竟然跑到了学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位名叫柏树彬的木工去天生桥的一个酒馆吃酒,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回工

棚休息。当柏树彬走到距工棚大约50米处时,突然看到前面两点亮光,这亮光在深夜里显得特别刺眼,定神一看,一只成年豹子趴在地上,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柏树彬被吓得背脊发凉、四肢无力,拼命往工棚跑,等回到工棚,人都吓瘫了。也许当时豹子不是很饿,它并没有追赶柏树彬。当工友知道此事后,纷纷拿起铁铲和棒棍,准备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结果豹子已经不见了。

后来有人在北碚龙凤溪两边的大片水竹林中发现过豹子的踪迹。“大跃进”时期,龙凤溪两边的水竹林被砍伐,豹子无处藏身,最后被人打死了。

(上接34页)

在著名鱼类学家施白南教授的主持下^③,对四川江河鱼类资源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对经济鱼类生物学与江河鱼类移养驯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四川鱼类研究的较全面、完整的成果。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学校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结合学校教学与教师的学识优势,在教育

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研究最具特色,成果也较为突出,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89部(含合著),教材43部。此外,美术创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有33件作品获全国和省优秀创作奖。

(责任编辑 李亚勃)

^③ 施白南(1906年—1986年),原名施怀仁,男,河北正定人。先后担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部主任、乡村建设学院教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国鱼类学会理事等职。他从事动物学的教学和科研,主持四川长江、嘉陵江、乌江鱼类资源调查和渔业区划研究等项目,先后撰写和指导完成高水平的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5部。《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第206页。

编者按：高校校史是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深入 research 校史，才能更好地挖掘一所大学特有的文化底蕴，因此本期《校史论坛》仍然把焦点放在校史研究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本文以“清华史苑”栏目的成长旅程作为切入点，结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的特点，分析了校史研究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为高校校史研究的延伸和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供高校校史研究工作者学习、交流。

从“清华史苑”栏目看校史研究 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文/王向田^①

大学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一个学校的精神之所在，它包括校园物质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行为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广义上说，校史工作对上述四种文化均发生作用，当然，最经常打交道的还是校园精神文化。

2004年，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改版之际，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与校宣传部与合作开办了“清华史苑”栏目。2004—2008年每年一个系列，计有“清华园里的第一”、“清华历史上的今天”、“院系开拓者”、“清华园名人故居”、“清华名人名言”五个主题。为迎接百年校庆，2009—2010以“百年清华记忆”为主题跨年度连载。截止目前，该栏目刊载文章已逾120篇，在校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被评为《新清华》最受读者喜爱的栏目之一，文章同时被清华新闻网转载，

获2006年度北京新闻奖(高校校报系列)作品(网络新闻专栏)二等奖。《科学时报》等报刊亦有连续转载。

“清华史苑”栏目的顺利开办、迅速成长是校史研究室对自身职责思考之后积极主动工作、学校大力支持、作者群勤奋努力、工作方法科学合理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栏目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味“清华史苑”的成长过程：栏目的开办及坚持源于对校史工作能够且必须在宣传历史、弘扬传统、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深刻认识；栏目文章的良好质量源于校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且促进研究进一步深入；栏目品牌的迅速形成源于合理科学的操作模式；栏目影响的广泛源于多种介质的传播及与校外刊物的良好合作。

^① 王向田，女，北京人，清华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六级职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华大学党史、校史、口述等。

一、栏目的开办及坚持源于对校史工作能够而且必须在宣传历史、弘扬传统、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深刻认识

1.大学最主要的任务是培育人才,校史必须为这一学校中心工作服务。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不断为祖国为人民培养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莘莘学子来到学校,不仅要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增长才干,更要树立理想、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对人才培养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大学的精神与传统文化,而形成大学精神最主要的因素是大学发展的历史。校史的工作内容是收集整理资料、研究编纂学校历史,总结办学规律,它既是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分,带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色彩,同时又有极强的现实功能,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学校教育方针、办学思路、治学理念、历史沿革,继承学校优良风格和传统,弘扬大学精神,营造校园文化等方面均可发挥积极作用。

2.校史宣传是常做常新的事业。自1921年清华建校十周年时即有《清华周刊》“清华园与清华学校”一文追溯学校历史,以后逢学校周年或重大纪念日必有书籍或文章回顾历史。反复宣传是否必要?前人的工作是否已足够?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材料的出现,后人对于前人、对往事的认识与评价,会有新的视角、新的体会和新的发现,校史工作研究及宣传需要推陈出新;不断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新进教工走进校园,他们对学校文化、历史很可能知之甚少、似是而非,对学校仰慕已久但离成为“清华人”、接受并继承发扬学校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差距。温家宝总理在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回信中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爱。”把真实的历史,以及历史所蕴含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在校园中甚至在社会上,进行准确、及时和有效地宣传,是校史工作者义不容辞、需要不断努力的事业。

基于以上认识,校史研究室在本身承担任务已经很重的不利条件下,主动联系,和宣传部合作开办了

“清华史苑”栏目。七年的坚持不懈,栏目通过一个个学校历史上发生的感人肺腑、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故事使人们加深了对清华的了解,通过校史回顾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行胜于言”的校训、“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二、“清华史苑”栏目的开办与校史研究工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清华史苑”栏目已连续开办七年,栏目主题也通过校史研究工作不断地延伸:从2004年第一期的“清华园里的第一”,到2005年的“清华历史上的今天”;从2006年的“院系开拓者”,到2007年的“清华园名人故居”;从2008年的“清华名人名言”,再到2009-2010年的“百年清华记忆”……不难看出,校史研究工作在一步步推动着“清华史苑”栏目的成长。

“清华史苑”栏目宣传的对象包括学校历史发展沿革、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校训、校风,典型建筑物,名人警句、格言等等,做到了注重传统、挖掘特色。文章除涉及清华通史,还涵盖了革命史、校园规划史、科技史、体育史、艺术史等各方面内容,内容丰富多彩。选题面如此广泛应该说得益于校史研究的深厚基础。清华1959年成立校史编委会,第一副校长刘仙洲任主任,校长蒋南翔也亲自过问校史工作。校史编写工作扎实有序开展但不幸因十年浩劫中断。历经曲折,《清华大学校史稿》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图书一等奖。1983-2003年间出版了《清华人物志》一至五册。1991年开始出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迄今已出版到第六卷,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数百万字的翔实资料。2001年出版《清华革命先驱》,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共清华地下党的历史。2004年成立清华大学百年史编写组,组织编写《清华大学百年史》。2006年校史研究室承担了学校985二期文科重点建设项目“清华大学史及校史专题研究”的课题,开展了清华科技史、清华文革史、清华体育史、清华文艺史、清华建筑规划史等专题研究。多年的研究工作、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清华史苑”栏目提供了坚强后盾,离开了基础性研究工作校史宣传则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清华史苑”栏目的开办也给校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促进了校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增进了校史研究的活力。“清华史苑”的定位是力求成为师生员工喜闻乐见的精品栏目,文章短小精悍、活泼有趣,前五个系列每篇文章字数约在1800字,第六系列在4000字左右。虽然史苑文章不是学术论文,但在写作上要求严肃认真,决不可人云亦云。作者们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遇到模糊不清的问题,仔细考证,广泛搜取资料,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三、栏目品牌的迅速形成源于合理科学的操作模式

开办之初,校史研究室与校宣传部协商决定:《清华史苑》栏目署名为“史轩”(即取“校史”与“宣传”各一字的谐音);按照“每年一个主题、连续刊载数年”的新思路,由两家单位组织力量形成作者群,分别撰写、统一审阅、隔期发表(有时因故可作调整),力求成为收到读者欢迎的精品栏目。

每个系列围绕一个明确主题的好处在于:一是便于作者紧扣中心、突出重点,使文章尽量短小精悍,符合报纸作为“新闻纸”一般不宜刊载长篇大论的媒体特征;二是利于形成系列,培养阅读习惯、赢得读者认同,从而发挥“品牌效应”;三是易于“新瓶装老酒”,即从新的角度对过去已经广为人知的史实进行再挖掘、再提炼,赋旧事以新意,撷旧闻出新篇。

以比较稳定的作者群的形式组织写作力量的好处在于:其一可以分散工作量,相对减轻作者负担;其二利于栏目风格的统一。随着学习、探索、磨合,作者们对系列的格式、文风等要求做到了心中有数,文章虽然出多名作者手笔,其特点、风格能够基本保持一致。七年来栏目作者的基本力量维持稳定,随着工作的开展,来自档案馆、文科处、博士后的写作力量先后纳入,他们很快适应了栏目要求。

经过摸索,史苑栏目的运行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程序:每年年底研究下一年度的主题,讨论相应的题材和内容,分解到人——制定详细工作计划表——作者如期交稿——审稿——刊登。为解决工作中具体问题,倾听作者建议,每年召开1-2次工作会。

七年来,《清华史苑》栏目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

从选题立义到谋篇布局,从遣词造句到排版插图,无不经过仔细研究、认真探讨、再三斟酌、反复推敲,牢牢把好撰写、编辑和审阅等各个环节。尽管其间由于各人观点不同,难免有争论、有商榷,但始终是合作愉快、成效明显,深受读者的好评,在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新闻评奖活动中屡获佳绩,成为《新清华》的品牌栏目。

四、栏目影响的广泛源于多种介质媒体的传播及与校外刊物的良好合作

当前的信息时代,网络是发展最为迅速的信息技术,是信息交流和扩大校史研究的有力手段。网络的时效性强、点击率高、阅读面广,可以很好地扩大校史研究的影响。“清华史苑”在《新清华》刊发的同时也在清华新闻网、清华校史网、学生“紫苑清华”等网站登载,引起校内外读者的极大兴趣,相当多的文章点击量在万次以上。

随着清华百年校庆的临近,社会对清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科学时报》表达了转载的愿望,经协商,自2009年起连续刊载“百年清华记忆”系列。《北京德育》等刊物对史苑文章也有转载。

“清华史苑”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史苑的持续开办,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比如“清华史苑”文章写作是作者们在已承担的繁重工作上附加的任务,在工作繁忙疲于应对的不利条件如何下保证文章的高质量如期刊载?是否能使栏目写作与校史研究更密切地结合、收取事半功倍之效?栏目如何长远规划?……诸多问题留待思考。

法国历史学家马鲁说:“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华史苑”无愧于历史的这一基本功能,作者们为清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为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尽了微薄之力。

本文的选用得到了清华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王向田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对王向田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 姚 恒)